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1

2022年2月 第23卷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二〇二二年第一期

总第135期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ISSN 1672-3163



9 771672 316225

029



1月7日上午，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惠建林到省社会主义学院走访调研，与院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李国华陪同调研，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瞿超介绍有关情况。



1月14日上午，省社会主义学院召开党史学习教育总结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总结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院党组书记瞿超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党史学习教育第十二巡回指导组到会指导。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本刊顾问

薛国安 吴胜兴 常本春 朱毅民

吴建坤 米其智 蒯建华 陈京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瞿超

副主任 魏晓蕾 陈锋 朱杰 钱照亮

陈童

编委 (按笔画为序)

任世红 李业 吴元庆 张吉林

张刚强 张美云 张思东 陈思

傅佩丽

主编 陈锋

副主编 陈思

目 录

2022 年 第 1 期 总第 135 期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 辑 出 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宋 好
责 任 编 辑:鲍跃华 吉 强 王天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论述的战略思维 / 戚如强 4

统战理论与实践

“两个法宝”的辩证统一与新时代统战工作守正创新 / 杨卫敏 11

新冠疫情下华侨华人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 廉同辉 耿洪宝 王 庚 25

更好发挥新时代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历史方位、经验启示、开创新局 / 罗 彪 31

政党制度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价值审视与实践逻辑 / 鲍跃华 37

试论民主党派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 / 华正学 冯文杞 49

理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三个维度 / 桑 雷 55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采编平台网址:<http://jsyb.cbpt.cnki.net/>
电 话:025-84287222

传 真:025-84287298 转 7221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千字文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 年 2 月 18 日
定 价:8.00 元

民族与宗教

从“民族平等”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百年演变历程 / 袁本昱

61

新的社会阶层

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的挑战与对策

——以浙江省为例 / 李腾

68

工作与学习

统一战线基地: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载体

——江苏百家统战基地选介 / 苏统轩

77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0 * 2022 - 01

习近平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论述的战略思维

戚如强

摘要:战略思维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重要思维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着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从思政课的价值、定位、举措、重点和保证等方面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战略思维,为新时代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入研究习近平关于思政课重要论述的战略意蕴,对于高质量办好思政课,发挥思政课在立德树人中的关键课程作用,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思想政治理论课;战略思维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1-00004-07

战略思维就是对关系事物发展整体的、长远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所进行的前瞻性、全局性思维。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1]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也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2]可见,无论是实现民族解放还是民族伟大复兴,都需要举目千里、谋定而动的战略思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教育和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放到战略高

度,2019年3月还专门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党中央就一门课程召开如此高规格的会议,这在新中国还是首次。习近平从党和国家发展全局角度就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简称“思政课”)的意义、重点和创新等方面做了全面阐述,具有极强的战略性。深入研究习近平关于思政课的重要论述,对科学谋划新时代思政课发展,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战略价值:固本铸魂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青少年进行马克思主义

收稿日期:2022-01-07

作者简介:戚如强,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专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重要论述的战略思维与实践路径研究”(19VSZ003)、江苏省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立德树人重要论述的理论逻辑与落实路径研究”(19ZTB0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课程、核心课程，其价值不仅表现在传递知识的学科价值，更表现为功在千秋的育人价值，后者更具有战略性。人是决定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思政课所育之“人”不仅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个体，更是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决定着党、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关于思政课的战略价值，习近平明确指出：“办好思政课，就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3]这一论述深刻地指出了思政课固本铸魂的战略价值。

首先，是固本，即保证制度存续。何为“本”？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这是最大的“本”。正如有学者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4]怎样固本？长远看，必须靠教育。习近平指出：“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5]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遇之变局，我国经济社会也处于加速转型期，国内外各种势力、各种思潮交流交锋交融加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给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安全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加大。在大中小学开设思政课，目的就是向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通过党史、国史和世情、国情教育，讲清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在推进民族复

兴的伟大斗争中，让学生能够辨别是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提高听党话跟党走的自觉性，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永续发展，巩固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所以，在最终意义上，思政课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拥护者、接班人和建设者，而绝不是旁观者、叛逆者和掘墓人，这是思政课的本质要义，也是最重要的战略使命。

其次，是铸魂，即凝聚思想共识。何以铸“魂”？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铸魂？要靠教育，尤其是对青少年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最为关键。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和治国遵循。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最重要的就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全党，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打牢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习近平指出：“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6]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正加速发展，社会利益关系日益复杂，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日趋多元，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在学生中大有市场。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实施“西化”“分化”图谋，学校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他们精心构筑各种社会思潮，宣扬无政府主义、普世价值、宪政主义等思想观念，炮制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污名化党的领导，这些错误言论在青少年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迷乱，严重影响主流价值认同。由此可见，对于青年一代的思想阵地，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必将乘虚而入。为此，思政课必须承担起对青少年“铸魂”、赢得下一代的重任，当务之急是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占领课堂阵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青少年廓清思想迷雾，拨正人生航向，凝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青

春力量。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战略定位：关键课程

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7]。这是对思政课的新认识、新定位，进一步提升了思政课的学科高度，阐明了思政课在各门学科中的特殊重要性，彰显了思政课在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战略属性。

首先，从课程性质上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课程的政治属性。教育是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大中小学开设思政课是党中央的决定，体现最高的国家意志，是我国学校社会主义属性的重要标志之一。西方国家学校课程表虽无“思政课”之名，但却有通过道德、公民、历史及国文等课程行“思政课”之实，以宣扬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二是课程的学科属性。思政课是一门专门的显性的“育德”课程。这里的“德”包括思想、政治、道德、法律和心理健康等方面内容。思政课在大中小学课程体系中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其主要任务是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标，以政治认同、家国情怀、道德修养、法治意识、文化素养为重点，培养能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因此，思政课在“育德”上具有目的性、计划性、组织性和专门性。从学科性质看，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非思政课莫属，其他课程则是重要的辅助和补充。思政课办学效果如何，将直接影响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实现，影响下一代的价值理念、理想信念和道德观念，这也将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关系党的事业能否后继有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次，从学科地位看，思政课是具有中国特

色的基础课程，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干渠道和核心课程，是高校课程体系的“第一课”，也是学习其他课程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平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思政课和其他专业课程共同承担立德树人的使命，虽然我们也强调“课程思政”，但毕竟学科分工不同，主要任务也不同，思政课是“使人成为人”的课程，专业课则是“使人成为某一种人”的课程。学好思政课有利于更好理解其他专业学科背后蕴含的人文精神和伦理价值，明确学习目的和知识的价值，从而把所学专业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高尚事业。因此，我们必须发挥思政课在课程体系中的政治引领和价值定向作用，做到以德领才、以德塑才。2018年在视察北大时，习近平明确提出：“人才培养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而育人是本。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8]所以，思政课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是青少年“拔节孕穗期”的关键课程。“学校要把德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9]，无论是在学科理论建设，还是在学校课程安排中，必须具有全局视野和长远眼光，不能再把思政课当作一般的知识课、通识课，要落实思政课是“课程中的课程”的地位和要求。任何主张思政课地位边缘化、课程设置隐形化、课程定位选修化、课程作用口头化的思想和言行都是错误的。

三、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战略举措：改革创新

战略举措是战略目标和战略使命的具体化，是任何战略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习近平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对思政课改革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战略规划，集中体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及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提出了办好思政课的“八个相统一”，即：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

统一；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八个相统一”体现了多维并进的顶层思路，是办好思政课的根本遵循，具有很强的战略性，具体体现在三个维度。

首先，尊重规律。规律体现了事物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从事教育活动，必须按教育规律办事。习近平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10]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思政课在遵循上述三大基本规律的同时，也有自身的特殊规律。“八个相统一”是习近平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在准确把脉思政课建设现状、科学总结思政课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从政治属性、科学属性和教育属性等方面对思政课教学规律的高度概括和创新表述，包含办好思政课的理念、理论、环境、过程、模式与方法等方面要求，内容博大精深，科学严谨，体现了思政课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本质属性，是思政课改革创新战略指南和行动纲领。

其次，问题意识。“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11]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习近平谈到了办好思政课，我们已经具备了政治、经济、文化和队伍等方面的基础和条件。但从办学效果看，思政课离党的要求、学生需要和社会期待仍有一定差距，需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久久为功。“八个相统一”是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总要求，其中每一个“统一”的背后都是在经验总结基础上的问题梳理。总体来说，当前思政课仍然不同程度存在着经典研读不精、理论深度不够、教学规范不强、研究学生不足、教材缺乏系统、内容更新迟滞、教学模式单一、方法老套陈旧、联系实际不够、评价体系不科学、部门协同不畅、长效机制缺乏等矛盾和窘境。正是这些问题倒逼思政课必须改革创新，才能完成

历史使命。“八个相统一”蕴含着习近平对办好思政课深层问题的清醒认识和超越现状的理论自觉，蕴含着引领思政课健康发展的大智慧、大战略。

再次，指明路向。习近平指出：“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12]“八个相统一”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指导方针和行动方案。首先，在教学内容上要增强思想性和理论性，这是思政课保持生命力的根基所在。思想政治理论课顾名思义有“思想”“政治”要求，但最终落在“理论”二字上，就是强调要用学术讲政治，用知识承载价值，才能更好地实现政治要求和价值导向。为此，必须学好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同时做好学术体系、学科体系、教材体系和教学体系的衔接和转化等基础工作。其次，在教学方法上要增强亲和力、针对性，这是思政课改革创新总的方法论要求。具体地说，教师在把握教学目标、课程安排和教材使用等原则要求的同时，要遵循事实逻辑、理论逻辑和情感逻辑的有机统一，注重学生的主体性、方法的灵活性、载体的多样性，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给学生深刻的学习体验”^[13]，“变学生‘被动参与’为‘主动共建’，变学生‘政治冷漠’为‘政治热情’，从而促进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动内化和吸收”^[14]。再次，在办学力量上要加强领导力、协同性，这是提高思政课实效的总体战略要求。要改变思政课及思政课教师孤军奋战的局面，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的领导，协调社会有关部门、学校党团工组织等，切实履行思想政治教育责任，努力营造全党全社会共同办好思政课的氛围。

四、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战略重点：关键在教师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习近平强调：“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15]这个论断抓住了问题的根本，深刻地指出了办好思政课，教师具有关键性的战略作用。正因为思

政课教师承担着如此重要的职业使命,习近平还特别提出了六项要求,即“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这“六要”提升了思政课教师的职业标准和从业门槛,凸显了思政课教师的特殊重要性。

首先,思政课教师的信仰对学生的引领作用更大。马克思说:“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是无所谓的。”^[16]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承担着立德树人的神圣使命。思政课教师则是工程师中的“工程师”,从事的是传播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崇高事业。习近平指出:“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17]因此,“政治要强”是思政课教师首要的职业素养,而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政治素养的根本标准。思政课教师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传播者,其马克思主义信仰程度直接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学生中的传播效果。习近平强调:“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承担着神圣使命。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18]对思政课教师来说,这个“道”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前最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和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试想一位思政课教师如果自己对马克思主义都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甚至质疑诋毁,又如何令学生“信而从之”?所以,只有自己“真信”,才能产生责任感和使命感,讲课时才能“现身说法”,才能令人折服,使人向往,才能用自己的理想去点燃学生的理想,用自己的信仰去引导学生的信仰,培养一代又一代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其次,思政课教师的人格修养对学生的示范作用更强。此处的人格主要是指道德人格。教师劳动的主体性和示范性决定了教师在教书育人过程中必须具备良好的品德风范和高尚的人格修养。习近平指出:“教师是学生道德修养的镜子。好教师应该取法乎上、见贤思齐,不断提高道德修养,

提升人格品质,并把正确的道德观传授给学生。”^[19]青少年时期是人格养成的关键阶段,教师是主要的模仿对象之一。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在课堂上面向学生“讲道德”的思政课教师,其为人处世上的道德品格及处理利益关系时展现的价值观对学生的示范作用更大。一个人格修养高的思政课教师,在政治上具有大局观,能够牢记职责使命,始终保有“四个自信”,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思政小课堂还是社会大课堂,自觉弘扬主旋律,积极传递正能量,给学生以正义、爱国、奉献的人格影响;一个人格修养高的思政课教师,在课堂上会表现出对思政专业的敬畏与热爱、对全体学生的关注和尊重,用专业魅力赢得学生,用爱与真情去感化学生,给学生以包容、敬业、友爱的人格影响;一个人格修养高的思政课教师,能够牢记身份角色,为人师表,恪守节操,带头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以模范的言行举止为学生树立榜样,给学生以诚信、正直、担当的人格影响。

再次,思政课教师的业务素养决定学生对马克思主义能否真懂真信真用。思路要新、视野要广,这是习近平对广大思政课教师业务素养提出的新要求新期待。他曾要求教师“始终处于学习状态,站在知识发展前沿,刻苦钻研、严谨笃学,不断充实、拓展、提高自己”^[20]。对思政课教师来说尤其如此。思政课涉及多领域多学科,内容广泛且有一定理论深度,因此对教师的知识素养和教学能力有较高要求。“教学就是使别人能学习并学会你所知道的东西”^[21],只有广泛涉猎、熟读经典、勤于研究、德艺兼修,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才能把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教给学生,用彻底的理论说服学生。同时,实践是不断发展的。青少年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时期,不仅要面临很多成长困惑,还要面对诸多世事变迁,比如科技革命浪潮、意识形态交锋以及我国“发展起来以后”的矛盾和问题等。对此,思政课教师要紧跟时代步伐,给学生指点迷津,帮助他们锚正人生航向,顺应历史

潮流,实现人生价值。这对思政课教师的理论素养和思维品质要求很高,不仅需要知识视野、历史视野、国际视野,还要有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和创新思维,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善于利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和处理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真正“掌握青年”,并变成“物质力量”。

五、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战略保证:党的领导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2]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对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来说,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办好思政课,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赓续,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既是思政课的本质要求,也是思政课健康发展的战略保证。

首先,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把握思政课发展方向。我们的学校是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学校,思政课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阵地,肩负着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的光荣使命。只有牢牢掌握党对学校 and 思政课建设的主动权,加强党对思政课建设的全面领导,才能确保学校思政课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才能保证思政课堂“姓马”“姓社”,才能始终用科学的理论武装青少年,用正确的思想引导青少年,培养出符合党的政治要求、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其次,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统筹思政课建设全局。当前,办好思政课具备一定的基础和条件,但仍然存在诸如工作格局不大、师资建设滞后、物质保障不足、长效机制缺乏等制约思政课长远发展的因素。要解决这些问题,单靠教育部门、思政课或思政课教师都不行,必须有一个超越各方之上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办好思政课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摆上重要议程,抓住制约思政课建设的突出问题,在工作格局、队伍建设、支持保障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23]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动员全党全社会力量,提高政治站位,摆脱本位意识与部门局限,建立统一领导、多方参与、协同配合的“大思政”格局;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调动多方资源,配齐建强思政课师资力量,从物质和精神上提高思政课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解决思政课建设在学科体系、教材体系、课程体系、教学体系与评价体系等方面存在的协调不衔接不科学问题,使思政课走上内涵式发展道路。

综上,如果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放到历史的大视野和国家发展的大格局中来考察,怎么强调其重要性都不过分。它不是一般的理论教育课,也不是普通的心智成长课,而是关系到制度赓续的国家战略课程。习近平高屋建瓴地论述了办好思政课的五个层面的战略要素,即战略价值、战略定位、战略举措、战略重点及战略保证。这五大要素构成了目标一致的战略思维体系,共同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新时代的“教育之问”,彰显了深邃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战略智慧,体现了思政课建设顶层设计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75.
- [2]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9.
- [3][6][7][12][13][15][17][23]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是,2020(17).
- [4] 侯惠勤.哲学与意识形态领导权[J].马克思主义研究,

- 2019(3).
- [5] 习近平.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N]. 人民日报, 2018-09-11(1).
- [8] 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8-05-03(2).
- [9] 习近平. 从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4-05-31(2).
- [10][18] 习近平.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16-12-09(1).
- [11]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05-19(2).
- [14] 黄岭峻, 许换换. 全媒体时代高校思政金课品牌传播研究——以《深度中国》为例 [J]. 湖北社会科学, 2020(2).
- [16]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1: 319.
- [19][20] 习近平.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教师: 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7、9.
- [21] 夸美纽斯. 大教学论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 288.
- [2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20.

责任编辑: 鲍跃华

“两个法宝”的辩证统一与新时代统战工作 守正创新

杨卫敏

摘要:与“三大法宝”的横向比较和“三个法宝”的纵向比较不同,“克敌制胜”和“执政兴国”两个法宝的提出,兼顾历史和现实,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统一战线本质要求和战略目标,明确了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统一战线的作用和实现途径。克敌制胜和执政兴国是接续、并存、互利的辩证统一,要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在正确把握机遇与挑战、团结与斗争、守正与创新、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中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统一战线,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彰显“两个法宝”作用。克敌制胜和执政兴国都是党的全局工作,必须加强组织领导,运用系统思维,坚持解近忧与谋远虑、治标与治本、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同步推进,建立健全大统战工作格局和社会化协同机制。

关键词:两个法宝;辩证统一;统一战线;战略策略;守正创新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1-00011-14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总结了建党百年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十个坚持”,其中第九个“坚持”明确统一战线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在第二个一百年中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力量,必须汲取第一个百年中党的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坚持优良传统和基本原则;同时又要着眼第二个百年目标准确研判统一战线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谋划和部署好新发展阶段统战工作,实现统战工作的守正创新、巩固发

展。《决议》关于统一战线“两个法宝”的新提法,既是对第一个百年中统一战线地位的高度概括,也为第二个百年中统一战线如何发挥作用指明了方向,全面深刻领会和把握其精神实质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概念与理念:“两个法宝”与“三大法宝”“三个法宝”的异同

我们党的历史上,统一战线与党的整个命运和事业息息相关。尽管在各个历史时期对统一战线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表述有所不同,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表明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是不言而

收稿日期:2022-01-15

作者简介:杨卫敏,浙江省委统战部二级巡视员、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非公经济统战工作(浙江)研究基地副主任、浙江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喻的。从抗战时期提出“三大法宝”开始，统一战线的“法宝”地位和作用一直延续下来，而且在内涵和外延上都不断有新的发展。

（一）“三大法宝”的思维逻辑及历史意义

全面抗战爆发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后，毛泽东同志对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三大法宝”有过不同的表述（包括文字和次序）。众所周知，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正式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党领导人民夺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以往重在关注统一战线作为“三大法宝”之一，而往往疏忽了“三大法宝”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其重大意义。一是彰显历史观。既是对党的继往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对未来中国革命的前瞻性方向性研判。二是彰显全局观。将统一战线完全摆到党和军队的大局中去。特别是在横向比较中，统一战线超越“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排在第一位，这在全民抗战和党的成长期似乎有点难以理解，但这正彰显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三是彰显系统观。“三大法宝”不是简单的相提并论，三者之间是有着内在逻辑关系的。革命年代“统一战线”的“战线”既是政治的，更直接体现在军事上、体现在“武装斗争”中；而“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自我提升的重要途径，事关领导权这个“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自此，统一战线的“法宝”观念深入人心，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不断彰显。

（二）“三个法宝”的思维逻辑及现实意义

统一战线在协商建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毫无疑问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仍然是“法宝”，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强调“统战工作是最大的工作”。此后经“反右”和“文革”的曲折，统一战线遭到破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应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应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1]江泽民同志在世

纪之交的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大重要法宝绝不能丢掉，作为党的一个政治优势绝不能削弱，作为党的一项长期方针绝不能动摇。”^[2]胡锦涛同志在2006年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三个法宝”的论述，即“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3]。在2015年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和发展了“三个法宝”的重要论述，他指出：“统一战线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4]《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将“三个法宝”修改为，“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体现了从第一个百年转向第二个百年统一战线地位、任务和作用的与时俱进。由此可见，与“三大法宝”的横向比较不同，“三个法宝”更侧重于纵向比较，表明统一战线过去是法宝、现在是法宝、将来仍然是法宝。

（三）“两个法宝”的思维逻辑及时代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决议》将此细化深化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和“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表明我们党对统一战线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已上升到新的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特别是处于“两个百年”交汇点，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转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统一战线还是不是法宝、如何发挥法宝作用，这是统一战线理论创新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剖析了党内存在对统一战线不重视和不会做工作的问题和现象，指出：“不会做统战

工作就像拿着海龙王的法宝不会用。”^[5]时至今日,对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仍然存在认识不到位的现象和问题,“过时论”“上层论”“内部论”仍然存在,对统一战线关注不够、对统战工作重视不足、对统战政策领会不透、对统战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警惕性不高时有发生。面临日益复杂多元的外部环境和我国全面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现在的统战工作不是过时了、不重要了,而是比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初期更重要了^[6]。值得关注的是,与“三大法宝”的横向比较和“三个法宝”的纵向比较不同,“克敌制胜”和“执政兴国”两个法宝的提出,兼顾历史和现实,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统一战线本质要求和战略目标,明确了在世情、国情、党情、统情发生重大变化背景下的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统一战线的作用和实现途径,对于全党全社会重视支持统战工作、领会把握统一战线的“岸”和“船”,有着重大指导意义。

二、辩证与统一:正确理解和把握“两个法宝”之间的关系

“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与“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容易被简单理解为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即: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敌人、夺取政权的法宝,也是作为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有效治国理政的法宝。笔者认为,作为一般性的理解无可厚非,但深入全面分析“两个法宝”之间的关系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两个法宝”是接续的关系

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现当代历史进程来看,克敌制胜和执政兴国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但两者都需要统一战线。尽管在各个历史时期党的统一战线的性质表述、成员构成、方针政策不尽一致,但目标和理念是一脉相承、接续发展的,都是出于全局考量、战略考量和政治考量。一是目标一脉相承。《决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民族复兴伟业,需要全民族广泛参与。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7]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力量,统一战线各方面人士加起来有几亿人之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8]。由此可见,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目标贯穿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始终,统一战线也贯穿始终。二是逻辑一脉相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的方针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而力量对比的不平衡是中国国情的关键点。”^[9]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10]由此可见,无论是民主革命年代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存在的历史逻辑和时代逻辑是一致的。三是理念一脉相承。统一战线的永恒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根本理念是求同存异,这两条贯穿党的百年统战史。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求同存异”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党同伐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其结果,前者是党内的空前大团结和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后者是党内军内的众叛亲离和原先“中间势力”的弃暗投明。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时期说过,所谓政治就是把我们的敌人搞得更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曾说:

“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做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至于那个意见相同的已经团结了的,就不发生团结的问题了。”^[11] 尽管表述不同,但其基本理念都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进入新时代新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提出的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基本原则,特别是首次提出统一战线工作的八条原则,既坚持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原则,又彰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重大理论创新^[12],体现了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相统一。

(二)“两个法宝”是并存的关系

克敌制胜的法宝与执政兴国的法宝,是统一战线法宝地位和作用的一体两面。一方面克敌制胜的目标是为了夺取政权、执政兴国,另一方面革命胜利后要执政兴国仍需要克敌制胜及其基本经验。这里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成为执政党后,“克敌制胜”仍没有过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要在敌人裹着糖衣的炮弹面前败下阵来,进而提出了“进京赶考”的新命题。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曾有代表对《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存有异议,理由是歌词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不合时宜。但也有党外人士不主张修改,认为原歌词有警示作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赞成“安不忘危”、居安思危的意识,认为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安定、安全,还需要与内外敌人及各种艰难困苦奋斗^[13]。

作为参加协商建国的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人民救国会,以已完成历史使命的理由宣布解散,毛泽东同志访苏归来后得知此事甚为惋惜,并竭力劝阻其他酝酿解散的民主党派,提出“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事实上,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乃至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都面临新的“敌情”,都需要与“敌”斗争、克敌制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充满着斗争的艰辛。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的。”^[14] 纵观百年,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党史统战史,不难发现“敌”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含义,正确研判“敌情”,瞄准“敌阵”精准发力,既不能夸大和恐惧,也不能缩小和麻痹,这是克敌制胜的前提和先决条件,在这方面我们有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一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949—1956年),克敌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从中取得全面胜利。主要包括:对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清扫和大陆全境的解放,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以及没收官僚资本主义和对民族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包括与不法资本家的斗争),对旧文化的推陈出新,等等。统一战线从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不断得到壮大发展。二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7—1978年),克敌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创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这一过程是在曲折中发展的。一方面与各种困难斗、与境内外敌对势力斗(包括中美对立、中苏交恶、万隆会议、金门炮击、达赖叛乱、新疆伊塔事件、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南海海战、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等),我国的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和外交都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另一方面,伴随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特别是反“右”扩大化和“文革”,克掉

的不是“敌”，而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生力量、良好的发展环境和重要契机，统一战线也遭到严重破坏。三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1978—2012年），克敌的目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都取得了巨大成功，消除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同时巩固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包括基本经济制度、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和实践取得巨大成功，反渗透反分裂反颠覆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有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统一战线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增添助力、减少阻力、形成合力^[15]，自身也得到了空前壮大发展，形成了大陆和大陆之外两个范围的联盟。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年起），克敌的目的是应对化解各种风险挑战，为中华民族复兴汇聚磅礴力量。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攻坚克难的任务更加艰巨。一方面，东升西降的趋势不可逆转，西方敌对势力变本加厉打压我们，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是长期的全方位的（涵盖经济、科技、政治、军事、外交、意识形态以及港澳台、西藏新疆等我国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也是新时代统一战线最鲜明的特征。我们党面临长期执政的风险，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不仅是伟大工程也是伟大斗争。特别是取得反腐败这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在意识形态交锋中、在与“台独”“港独”“藏独”“疆独”和境内外三种势力斗争中以我为主，在抗击疫情、应对贸易战等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中掌握主动权，都需要有克敌制胜的斗争精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安

不忘危、存不忘亡、乐不忘忧，时刻保持警醒，不断振奋精神，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6]

（三）“两个法宝”是互为的关系

一方面，执政兴国可以为克敌制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民主革命时期敌强我弱，我们运用统一战线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很迫切很直接，但可用资源、手段和渠道毕竟相对有限，像对民族、宗教、华侨以及经济界主要做团结引领的工作，而直接的管理工作在旧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党的统一战线可以在资源、力量、手段、制度、体制、机制等方面为克敌制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另一方面，克敌制胜可以为执政兴国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将统战工作作为“最大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从全局高度将统战工作作为“我们党必须花大心思下大力气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这些在根本上都是为了解决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这个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特别是新时代执政兴国面对的“敌情”更为复杂，对克敌制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斗争是多方面的，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都需要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全面从严治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消除金融领域隐患、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治理生态环境、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全面依法治国、处理群体性事件、打击黑恶势力、维护国家安全，等等，都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17]克敌制胜可以为执政兴国创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多的服务。

总之，克敌制胜和执政兴国都离不开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要在把握“两个法宝”辩证统一关系中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从“两个法宝”的辩证关系出发，统一战线的全部工作可以归结

为两手抓：团结与斗争——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促团结。早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同志在阐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策略时就指出，“既斗争又联合，以斗争促联合”，进而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和“有理、有利、有节”。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统一战线重要策略艺术，提出：

“要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要抓主要矛盾、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要根据形势需要，把握时、度、效，及时调整斗争策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18]与此同时，又立足新时代创造性地提出了政治底线、最大公约数和最大同心圆理论。一方面强调，“对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危害社会主义政权、危害国家制度和法治，损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不能让其以多样性名义大行其道。这是政治底线，不能动摇”；另一方面强调，“除此之外，对于其他各种多样性，要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寻求最大公约数”，“只要把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大，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19]。

三、战略与策略：如何运用“两个法宝”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实现民族复兴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党总是能够在重大历史关头从战略上认识、分析、判断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策略，这是党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保证。”“战略和策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要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20]新时代统一战线已从政治联盟向共同体转变，这种共同体是目标、事业、利益、价值、责任的共同体的集大成^[21]。从广义上讲，这种共同体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是实现世界大同。但这一漫长的过程充满困难、风险、曲折、挑战：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对冲，“一带一路”建设和新冷战思维的碰撞，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与“台独”“港独”逆行的对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内外“三种势力”的斗争，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交锋，都是长期而复杂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方面，统一战线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心思、下大力气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22]，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战略上全局上谋划和开展统战工作。另一方面，“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更是统一战线的政治优势，必须根据统一战线的时代特征和战略目标任务，坚持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方针、政策和策略的守正创新。在新时代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两个法宝”作用，必须正确把握战略和策略的辩证统一关系，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化解风险、危机和挑战，凝聚人心、智慧和力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起磅礴力量。

（一）机遇与挑战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统情的变化发展，使统一战线发展面临前所未有之机遇和挑战。从世情看，一方面，东升西降趋势不可逆转，国际格局深刻调整，随着外资、侨资、台资、港资向中国大陆的流入以及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回归，“一带一路”建设的拓展和民营企业走出去发展，统一战线面临重要发展契机；另一方面，中美竞争对抗性上升，美方对我国经济科技上围堵打压，在涉及我国主权领土安全、意识形态领域等多方面施压挑衅、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试图在民族、宗教、涉疆、涉藏、涉台、涉港以及政党制度、民营经济、知识分子、人权民主等领域打开缺口，并将我国统战工作污名化，统一战线已被推向国际斗争的风口浪尖。从国情看，一方面，把握新发展阶段、树立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

局背景下民营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科技人才进入窗口期,实现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背景下统一战线成员重心下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优势将进一步发挥和展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民族宗教事务依法管理和有效治理融合发展;另一方面,民营经济转型中的“阵痛”更加凸显,特别是对共同富裕存在一定认识误区,有人认为先富带后富是限高、抑富、搞平均主义,三次分配是针对私企的劫富济贫,私企将面临慈善勒索,影响做大蛋糕的信心,也成为影响阶层关系和谐甚至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从党情看,一方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统战工作在党建的快车道上奔跑,“党建+统战”成为很多领域统战工作的常态,而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集中统一领导使得大统战工作格局机制进一步健全、党委做统战工作的主体责任得到落实;另一方面,执政党党建不断加强与参政党党建相对滞后使多党合作特别是合作共事不匹配的风险增加,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难度加大,党外干部的发现、培养、使用、管理面临新的情况和新的短板,党外干部成长台阶和锻炼平台不足。从统情看,一方面,统一战线涉及党内党外、体制内外、海内海外、线上线下,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来越大,团结面将越来越扩大;另一方面,社会结构深刻调整,统战成员思维观念、利益诉求更加多元,特别是新一代党外人士、新生代企业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引领工作面临新的情况,港澳台侨新生代祖国观念淡化,而新技术革命、数字经济和网络社会对统一战线带来巨大冲击,谋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面临新的挑战,统一战线发挥法宝作用面临新的考验。上述“四情”对统一战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全面的系统的,我们必须准确研判,从总体和全局上加以把握。以民族工作为例,当前民族工作面临新的阶段性特征:各民族人口大流动大融居趋势不断增强,但影响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

深度交融的因素仍复杂多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不断牢固,但民族领域意识形态斗争仍尖锐复杂;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相对突出;反分裂斗争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但实现边疆长治久安的任务仍十分艰巨;我国解决民族问题制度优势日益凸显,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利用所谓“民族问题”对我国遏制打压变本加厉。

机遇与风险总是相伴的,也是辩证的、可以转化的。要看到危中有机、视危为机,才能克服危机、化危为机。统一战线面临的风险挑战不仅是全方位的而且事关大局,涵盖基本制度、意识形态、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对外关系和自身建设等方面,涉及经济风险、金融风险、科技风险、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国家安全风险以及保密风险、廉政风险、能力风险等。大体可分为硬风险、软风险和基础风险。一是硬风险,这类风险看得见摸得着来得急,必须精准研判、制定预案、周密部署、尽快应对、妥善处置。如: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下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如何引导民营企业树立发展信心,同时协调帮助解决缺电、缺人、缺芯、缺箱、缺利等短板;疫情反复下海外侨胞生存发展环境堪忧,海外涉侨突发事件多,帮助海外华侨解决生存发展以及人身安全和权益不受侵犯的问题日益突出;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经济科技打压遏制下,海外留学人才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难,使我国人才工作面临风险挑战;西方反华势力在政治上对我国丑化西化分化,反渗透反分裂反颠覆斗争存在长期化、复杂化、尖锐化的风险,特别是“台独”势力挑衅滋扰触发事端风险加大,反中乱港势力与境外反华势力勾连更加紧密,境内外“三种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制造新的突发性事件风险仍然存在,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中存在诱发矛盾纠纷、引致群体性事件的风险。硬风险具有战略性紧迫性,解决不好不仅会

影响全局也会加大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难度,加快加剧软风险的进展。二是软风险,这类风险短期之内不会表面化,但其隐患是长期的递进的,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会成为削弱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动摇统一战线根基的心腹大患。例如,对我国基本制度存在认识模糊的风险,意识形态方面存在消解主流价值、干扰人心向背的风险,少数人在思想认识上与我党主流价值背离,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进程中存在的阻力矛盾、偏向甚至逆向化等风险。三是基础风险,主要是大统战格局和统战部门自身建设存在的短板和问题,这些问题如果长期不解决会抑制和影响硬风险和软风险的化解。例如,不重视统一战线和不会做统战工作的问题在一些地方仍然没有完全破解,党委统战意识和统战工作主体责任不够强,大统战工作格局机制和统战工作网络不够健全,统一战线基层基础薄弱,存在力量单薄和本领恐慌叠加,特别是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任务新技术,统战干部存在能力不足、难以胜任繁重复杂敏感工作的风险等。

统一战线各方面成员有数亿之众,民族宗教、港澳台、非公有制经济、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多党合作等领域的风险性质不尽相同、风险程度高低各异。早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指出:“要从‘冷’‘热’两条线谋划统战工作。”^[23] 防范应对风险挑战,必须立足两个大局、统筹国内国外、盯紧线上线下,既要谋长远又要虑当前,既要着眼全局又要紧盯统一战线领域的重点风险隐患,既要筑牢堤防又要主动出击,既要治标又要治本,不断提高防范化解风险能力和本领,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一要全面应对、严密排查,补齐短板、扎紧篱笆,逐一化解、消除隐患。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底线思维、问题导向,全面梳理当前统战工作中存在的风险挑战,认真开展对统一战线各领域风险隐患的大排查,系统掌握统一战线面临的风险和问题,坚决防止出现重大风险。二要分类施策、有的放矢,

精准“拆弹”、靶向根治。对找上门来的硬风险要未雨绸缪、见招拆招,对厚积薄发的软风险要主动找上门去摸清研透、对症下药,对客观存在的基础风险要俯下身来补齐短板。重点聚焦民营经济金融风险处置、民族宗教领域和谐稳定、党外知识分子领域凝心聚力、港澳台侨争取人心力量等问题,找准根源结症,提出针对性举措。三要建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长效机制。坚持解近忧与谋远虑、基层与上层(夯实基层基础)、实体化(实体化阵地建设)与数字化(构建统战系统整体智治体系)、治标与治本同步推进,不断完善监测预警、评估研判、协同化解机制,牢牢守住统一战线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政治底线。

(二) 团结与斗争

自从有党的统一战线以来,团结与斗争就是一体两面,斗争是手段、团结是目的。统一战线坚持既联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团结),进而明确联合(团结)什么、斗争什么以及如何开展联合(团结)和斗争,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们强调大团结大联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斗争相对讲的少了些。党的十九大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强化斗争精神,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发展的历程充满着斗争的艰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斗争之艰难、流血牺牲之惨烈世所罕见。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经历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我们都毫不畏惧、奋勇向前,以坚忍不拔的斗争赢得了胜利。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总结运用好党积累的伟大斗争经验,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掌握斗争策略,练就斗争本领,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大无畏气概,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24]

关于如何应对和处理矛盾,1956年毛泽东同

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明确提出了正确区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前提。这一原则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指导意义，要求我们在应对风险挑战时善于区分和处理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敢于斗争，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切实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做实做好。”^[25] 既保持斗争精神又增强斗争本领，这对当前统一战线来说尤为重要。

一方面，统一战线成员是特殊的群众，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对统一战线中的差异和矛盾不能采取斗争打压的方法，强迫人家服从我们，而是通过引导、教育、沟通、协调、化解的方式广泛凝聚共识、智慧和力量，但对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要敢于思想交锋，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巩固和发展大团结、汇聚民族复兴的伟力。比如，坚持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既要引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增强政治自觉和“四个自信”，共同抵制西方多党议会制对我国影响，又要支持民主党派以党为师、加强和完善内部监督、不断推进参政党建设、进一步履行好参政党职责；而坚定不移推进共同富裕的努力方向，就要让统一战线成员全面科学领会理解把握共同富裕的内涵实质，消除各种疑虑，调动广大统战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让每一名统战成员都成为共同富裕的直接参与者、积极贡献者，在此基础上加强资源整合、聚焦重点领域合力攻坚，充分彰显统一战线助推共同富裕的优势领域和专业强项，合力打造精品项目和品牌。再如，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了非公有制经济“两个毫不动摇”，同时强调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为开展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进一步明确了基调，我们要引导民营经济人士积极参与致力共同富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实践。

另一方面，对于境内外敌对势力渗透分裂颠覆、破坏统一战线等图谋和活动必须勇于斗争、善于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党员、干部有没有斗争精神、是不是敢于担当，就要看面对大是大非敢不敢亮剑、面对矛盾敢不敢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不敢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不敢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不敢坚决斗争。”^[26] “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27] 统一战线面临的各種风险与我国核心利益息息相关，对此我们必须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战略意识，破解斗争精神缺乏、思想引领不到位的问题，加强研判和预警，守牢底线、引领高线，在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

（三）守正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断推进统战工作守正创新。”^[28] 守正，就是坚持党的百年历程形成的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特别是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统一战线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创新，就是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断调整理念思维、载体抓手、渠道网络、方式方法、体制机制，与时俱进地开展统战工作。守正方能巩固、创新才会发展，统一战线工作只有守正创新才能在新时代新阶段发挥好克敌制胜和执政兴国“两个法宝”的作用。一方面，所有的“创新”必须是在“守正”的前提下进行，偏离“守正”的盲目“创新”本身也是一种“风险”；但另一方面，“守正”绝不是因循守旧，必须研究

探索与适应新情况破解新问题相匹配的手段和方法,按部就班的守旧不仅不能守正,反而有倒退和萎缩的风险。

一是统一战线化解风险隐患需要守正创新。统战工作是特殊的群众工作和政治工作,政策性很强,策略方法要求很高,做统战工作既要政治坚定又要本领高强。一方面,要强化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做党外工作越要心中有党”^[29],“做民族宗教工作的同志党的意识要特别强”^[30]。坚持从政治上看问题,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牢记“国之大者”,把党的领导贯穿始终。另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加强理论武装,树立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深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提升应对风险挑战的素质和能力。

二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引领工作需要守正创新。统战工作是做党外人士的工作,思想政治引领是首要的任务。思想政治引领工作往往在统战对象自身大环境利好、政策受益、事业顺利时好做,逆境中空洞的思想政治工作往往乏力。面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生代企业家、新乡贤人士、港澳台侨新生代和其他新一代党外代表人士已成为统一战线主体成员的实际情况,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既要竖起高线、补齐短板,又要转型升级、迭代更新。一方面,要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及统一战线其他基本原则,统一战线才能为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积聚更多力量、为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凝聚更多人心、为提高党的执政水平汇聚更多智慧。另一方面,又要加强思想政治引领的针对性有效性,做到虚实结合、主体内化、转型升级、讲求实效。

三是新形势下统战工作提质增效需要守正创新。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和信息化、数字化、网络社会带来的挑战,统一战线一方面要坚守初心,

总结汲取百年统一战线经验传统;另一方面,要与时俱进研究新情况、谋划新思路、解决新问题,进一步把握统一战线发展规律,提升统战工作科学化水平,实现统一战线高质量发展。

(四) 政策与法律

政策性是统一战线一个政治优势,党的百年历史上统一战线工作主要靠政策开展。不要说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实际上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虽然国家也出台了涉及统一战线的一些法律法规,但计划经济年代统一战线工作主要仍靠政策。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和逐步与国际接轨,将那些急需且可以法制化的政策固化下来成为法律法规,有利于强化执行的刚性和对外交流交往。新时代统一战线作为“两个法宝”,首先是“法”然后才是“宝”^[31]。当前,无论是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还是执政兴国的法宝,加快推进统一战线领域的立法、引导统一战线成员守法、提升统战(民族宗教)干部执法能力和水平,都显得十分重要而紧迫。

一是既要提高政治意识又要强化法治思维。一方面,统战工作不是一般性事务而是政治性政策性极强的政治工作,讲政治用政策是统战工作首要的理念。特别是统一战线面对的风险挑战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必须提高政治站位,从全局上战略上考量、谋划和应对。另一方面,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统战工作必须强化法治思维和治理思维,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各种复杂敏感问题、化解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讲,政策是团结的工具,法律是斗争的武器,特别是当前化解风险挑战既靠政策更靠法律。要明确把握政策与法律的边界,哪些该用法律哪些该用政策,辩证施策、综合用法,使政策法律刚柔并济、相得益彰。特别是对突发事件,既要增强政治敏锐性和大局意识,建立预警机制,及早发现,又要在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基础上制定稳妥周密

的处置方案；既依法处理又注意方式方法，善于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在此过程中，既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又尊重、维护统战成员的合法权益，并按照相关政策适当照顾利益，从而既妥善化解风险和挑战又广泛凝聚人心和力量。

二是既要注重团结引导又要严格依法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讲，新时代统一战线发挥“两个法宝”作用，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相统一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体现。作为领导方式，党要引领人、团结人、凝聚人；作为执政方式，党（通过政府）要依法管理相关活动和事务，督导相关组织和人员守法。特别是在民族工作、宗教工作、侨务工作中，这种双重属性尤为典型。领导主要靠政策，执政主要靠法律，既要加强和改进政治领导又要强化和提升依法行政。一方面，统战工作是特殊的群众工作，对党外人士的思想引领要去行政化，讲求政策策略和方式方法，按照制度安排和政策安排平等协商、体谅包容、适当照顾。另一方面，统一战线成员除了统战身份外也是自然人，守法是基本的义务，不能把统战身份和统战政策作为规避法律制约的理由。要完整、全面、准确把握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提升执法水平、降低法律风险，引导广大统战成员增强公民意识、守法意识。法律是底线，政策是高线，法律具有严肃性、权威性、强制性和公正性，而政策尤其是统战政策具有灵活性且有感情有温度，在团结引导和管理服务中不能顾此失彼，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如：在非公经济人士中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活动，引导他们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同时加强管理和服

务；在宗教工作领域，既坚持宗教中国化又推进宗教工作法治化，支持引导宗教界加强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全面从严治教，带头守法遵规、提升宗教修为。

三是既要依靠党内法规又要完善政策体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协调

推进统一战线领域法治建设”成为统战部门主要职责之一。统战部门要全面强化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扛起统战领域法治建设的责任。但与此同时必须明确，统战工作本质上是党做人的思想政治引领的工作，所有的政策不可能都成为国家法律法规，片面强调统战政策和统战工作全盘法治化不仅是不现实的反而会降低统战工作的政治性、策略性和艺术性，影响“两个法宝”作用的发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注重运用党内法规管党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32]《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作为重要党内法规，是统一战线工作领域的“上位法”，要以此为指导持续推进统一战线政策法规体系建设，全面构建统战工作的目标体系、政策体系、工作体系、评价体系，不断提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智能化科学化水平，使各领域统战工作既有“尚方宝剑”又有“基本遵循”。

四、领导与保障：大统战工作格局与社会化协同机制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颁布为建立大统战工作格局和社会化协同机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贯彻落实是个长期的任务。当前对新时代统战工作认识不到位、忧患意识不强、力量和能力不足、体制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症结尚未完全破解。特别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各领域风险往往是短期和长期矛盾交织，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交织，国内和国际因素交织，防范化解工作难度大、要求高，必须加强组织领导，运用系统思维，坚持解近忧与谋远虑、治标与治本、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同步推进，建立健全大统战工作格局和社会化协同机制。

（一）全面把握党对统一战线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对统一战线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新时代统一战线最鲜明的特征，要全面理解和把握。一是明确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确保统一战线沿着正

确的政治方向前进。要发挥党总揽全局、统筹谋划、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抓方向抓战略抓引领、抓大事抓要事抓难事,在党内党外、体制内外、海内海外和线上线下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使统一战线真正成为新时代攻坚克难和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二是强化党委做统战工作的主体责任和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为做好统战工作提供组织保障。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大统战工作格局,不仅要在各个层级落地落实,还要在不同领域落小落细。例如:在宗教工作领域,要加强党对宗教工作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宗教工作体制机制,推动构建党委领导、政府管理、社会协同、宗教自律的宗教事务治理格局。要层层压实政治责任,形成防范化解统一战线风险挑战的完整责任链条闭环。三是树立以党建为引领的“全域统战”理念^[33],打造社会化、开放型统战工作网络平台。把统战工作进一步融入大党建格局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实现机制共建、阵地共创、资源共享、作用共显、合作共赢。发挥统战工作领导小组职能,及时了解各地各部门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贯彻落实情况,运用好考核、巡视和问责手段,加强督促检查指导,确保各项规定有效贯彻落实。

(二) 系统补齐统战各领域的工作短板

一是补齐政治敏锐性不到位的短板。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共同富裕,认真查摆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统战工作薄弱环节,以钉钉子精神解决好突出问题,切实守好统一战线防风险阵地。二是补齐统战方式不够适应短板。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引领等方式方法,更加有效争取统战成员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人心,把党外各方面力量更好团结起来。三是补齐组织渠道不够畅通短板。进一步丰富工作载体和抓手,把统战成员特别是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更好地组织起来,发挥其作用,用好换届契机全面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三) 进一步建立健全工作体制机制

一要强化体制机制的整体效能。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议事制度和运行机制是总体协调机制,民主党派、民族宗教、民营经济统战、港澳台海外统战和新乡贤工作等各领域工作机制是具体事务机制,要加强两者的统筹整合、工作指导和有效衔接,全方位发挥体制机制的长效作用。二要创新考核激励机制。新时代统战工作要守正创新,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和正确政治方向的大前提下积极探索载体抓手、手段渠道、方式方法方面的创新,要树立正确的考核导向,不靠简单扣分问责,酌情建立容错机制,形成鼓励敢于担当、善作善成的激励机制。三要完善联动防控工作机制。建立健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风险评估研判机制、风险协同化解机制。强化横向协同和纵向联动,进一步构建省市县协同、部门间协作、社会各方面参与的风险联动防控工作格局。发挥好基层组织和网格的作用,激活风险防控的神经末梢。以数字化改革为契机,构建统战系统整体智治体系,加强建立覆盖统一战线各领域各方面的风险监测平台,对风险因素进行动态监测、实时预警、及时研判、有效应对。

(四) 着力夯实基层基础

统战工作是特殊的群众工作,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统一战线重心下移,做好统战工作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特别是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加强基层统战工作十分重要而紧迫。当前,基层统战工作存在点多面广、力量分散情况,“空心化、边缘化、碎片化”等问题尚未得到完全解决,要在体制创新、机构设置、制度健全、干部配备、阵地建设、经费保障、业务提升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一是以中心大局为导向集聚基层统一战线资源。实践表明,十二类统战对象到了乡镇(街道)特别是村、社区,可以通过一定组织形式(如新乡贤联谊会等)整合,发挥集聚作用。要充分鼓励基层以新乡贤联谊会以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

谊会、新生代企业家联谊会、基层商会等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在助力乡村振兴、基层治理、共同富裕等重大战略方面长效发力。二是以服务为导向加强基层统战阵地建设。面向统一战线一线、社会各界人士和基层群众,提供开放式、集约化、共享型综合服务,活跃基层统战工作,夯实基层统战工作。三是以规范为导向加强基层统战工作网络建设。要努力形成覆盖乡镇街道、农村社区、高校园区的统战工作网络,特别是要把宗教事务纳入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网络化管理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推动网格化管理、平安宗教活动场所创建等全覆盖。四是以问题为导向精心创新品牌。针对基层统一战线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区域性顶层设计,打造既具有区域特色又富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品牌。例如,宁波市鄞州区有128幢楼宇,这些楼宇是一个个“竖起来的社区”,集聚一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当地不仅创出了“楼宇统战”的品牌,而且形成了“四个知道”与“四个跟上”^①的基层统战工作新理念。台州市加强顶层设计,在全市各乡镇(街道)推广“一纲四目”的基层统战品牌——以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为总纲,以新乡贤工作、“一庙一故事”、基层商会、基层协商民主为重点,丰富了基层统战工作内容,夯实了基层统战工作基础。

(五) 不断加强队伍建设

新时代特别是新发展阶段统一战线对象不断增多、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机遇与挑战前所未有,对加强统一战线党内和党外两支队伍建设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与时俱进地推进党外代表人士“六域四环五能”^[34]建设。针对新一代党外代表人士的特点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新形势新情况,既讲求分类施策又着眼全链条谋划,既注重总结好的做法又着力创新抓手渠道,既重视政治理论素养培育又注重实践锻炼培养,既重视能力提升又加强监督管理,为统一战线可持续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二是善于延长工作手臂,积极化统战对象为统战力量。在任务加重的情况下,统战机构和部门力量不足的问题相对突出,对此要善于借力,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组织和商会、知联会、新联会、网联会、新乡贤联谊会以及党外代表人士在联系和发动各自成员和界别群众中的特殊作用,发挥“一根头发”带动“一把头发”的成效。特别是新一轮改革后,基层民族宗教部门任务重、压力大、人手不足问题比较普遍。一方面,要因地制宜地加强自身建设,完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工作保障;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好以党政干部为主导、以宗教界代表人士为主体、以宗教学研究者为辅助的三支队伍的作用。三是切实推进统战机关和统战干部的变革跃迁。积极推动统战部门组织结构变革、运行机制变革、干部能力变革和团队文化变革,实现统战机关和统战干部的迭代跃迁。统战工作是政治工作,统战干部是政治干部,既要政治坚定又要本领高强。新形势、新任务和风险挑战需要复合型干部,要求统战干部既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战略意识,又懂经济、懂法律、懂网络技术。特别是应对化解统一战线面临的风险挑战,必须全面提升统战干部队伍的素质和能力。一方面,要切实增强政治风险、法律风险、保密风险、廉政风险等风险意识,敢于担当、敢于斗争,善于运用政治观点和政治眼光看待统战问题,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更好地肩负起防风险、保安全、促发展的政治责任;另一方面,要不断提升统战干部应对本领,把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充分融入日常工作中,全面提升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化解风险能力,增强塑造变革能力,不断提高对数字化改革的把握能力、引领能力、驾驭能力,用以研究、防范、化解统一战线风险隐患,系统提升统战领域整体智治水平。

注①:“四个知道”与“四个跟上”:知道统战对象在哪里,组织建设要跟上;知道统战成员在想什么,思想引领要跟上;知道统战对象有什么要求,服务管理要跟上;知道统战资源优势在哪里,作用发挥要跟上。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文选: 第 3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96.
- [2][15] 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江泽民就做好进入新世纪的统战工作发表重要讲话 [N]. 人民日报, 2000-12-05(1).
- [3] 春晖万里 党的领导人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纪事 [EB/OL]. (2015-05-16).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16/c_127807518_4.htm.
- [4]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 [N]. 人民日报, 2015-05-21(1).
- [5][8][10][19][22][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262、264、262、264、262、267.
- [6][12][21][31] 杨卫敏. 新发展阶段统一战线的时代内涵: 新变化、新趋势、新布局 [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5): 15-23.
- [7] 毛泽东选集: 第 4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257.
- [9] 毛泽东选集: 第 1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55.
- [11] 毛泽东文集: 第 7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92.
- [13] 几度沧桑国歌的诞生及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N]. 人民日报, 2004-03-31(9).
- [14][17][18][27]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9-09-04(1).
- [16][26] 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发表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0-01-09(1).
- [20]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继续把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引向深入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N]. 人民日报, 2022-01-12(1).
- [23] 杨卫敏. 习近平总书记统一战线重要思想论纲 [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5): 3-19.
- [24]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12-29(1).
- [25]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9-01-22(1).
- [28]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审议军队《政治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N]. 人民日报, 2019-01-22(1).
- [30] 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习近平讲话李克强主持 [N]. 人民日报, 2016-04-24(1).
- [32]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发挥好党内法规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障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重大作用 [N]. 人民日报, 2021-12-21(1).
- [33] 杨卫敏. 全域统战: 新时代大统战工作的总驱动 [J]. 统一战线学研究, 2019(3): 93-101.
- [34] 杨卫敏. 习近平关于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思想研究 [J]. 观察与思考, 2017(9): 47-56.

责任编辑: 王天海

新冠疫情下华侨华人传播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廉同辉 耿洪宝 王 庚

摘 要: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的目的在于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塑造中国国家形象。当前,由于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刻意抹黑中国、一些西方民众对中国存在偏见、西方媒体对舆论垄断性较强、我国“抗疫”报道有待改进等原因,新冠疫情下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存在一定困难。为此,应该加强在西方国家主流媒体上的辟谣力度,充分发挥互联网媒体的传播功效,加强与国外电视媒体的合作,加强海外华侨华人与当地民众的沟通与互动,提升抗击疫情成果报道的说服力,进而有效推动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

关键词:新冠疫情;华侨华人;国家形象;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D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1-00025-06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国际舆论格局体现为“西强我弱”,要增强国际话语权,加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设,让全世界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在201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把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视起来。可以说,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的目的在于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塑造中国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是一个多维构建,需要划入不同亚类别或维度^[1]。国家形象是指个体对某国家的所有描述性、推断性和信息性信仰的总和,

包括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因素^[2],它有一定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3],并且具有跨文化语境的特性^[4]。目前,对国家形象的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形象的影响因素研究:国家的客观状况,如国家行为与国际地位^[5]、地缘政治^[6]和国家双边关系^[7]等;媒体报道,媒体是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8][9]};民众的主观因素,诸如性别、教育程度等人口学特征^{[10][11]}、民众的认知度和好感度^{[12][13]}、价值观和文化取向^[14]等,都是影响国家形象的重要变量。二是国家形象的塑造及传播研究:对外传播是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力量和主要途径,对外传播实力是国家形象建构的决定因素^{[15][16][17]};媒体能快速传播国家

收稿日期:2022-01-03

作者简介:廉同辉,南京财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家形象和社会化媒体;耿洪宝,南京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庚,南京财经大学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新冠疫情事件下国外民众的中国国家形象认知和传播研究”(20SYA-045)的研究成果。

形象^{[18][19][20][21]}。三是国家形象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国家形象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应对国际竞争的重要途径^[22]，并影响产业和企业的发展，影响产品出口^[23]。

新冠疫情自暴发以来，严重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为防控新冠疫情，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党中央和国务院及时应对，科学布控，精准施策，各地纷纷出台“硬核”防控措施，使抗击新冠疫情（以下简称“抗疫”）行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国外新冠疫情暴发后，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政府积极支援意大利、伊朗、法国、西班牙等疫情严重的国家，面向国际社会主动介绍中国防疫抗疫的作为与成效，展现了中国的勇气与担当^[24]。对此，西方媒体一方面客观地呈现积极抗疫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存在一定的“选择性不闻”^[25]。

海外华侨华人是促进中外交往的纽带，也是外界感知中国的重要媒介，华侨华人可以真实地宣传中国国家形象，推动中国与侨居国良性互动。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媒体、社团等各种途径，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相互了解，塑造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广大华侨华人了解中国和侨居国的政治及社会情况，深知国外公共舆论的运作规则，是准确塑造和维护中国国家形象不可替代的积极力量。同时，他们也能全方位展示中国和平、和谐、务实、求同存异等正面形象，有效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华侨华人不仅熟悉中外文化，而且是侨居国的重要知识群体，可以积极搭建人文交流网，推动彼此深入了解、友好共处。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提出，世界华侨华人要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外民众相互了解和理解，为实现中国梦营造良好环境。

二、新冠疫情事件下中国国家形象国际传播的问题剖析

（一）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刻意抹黑中国

一些西方民粹政客把疫情当成政治工具，罔顾科学，传播“政治病毒”，将疫情归咎于中国。

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等人密集接受媒体采访，声称疫情源头在武汉，指责中国2019年12月就知晓疫情但行动速度不够快，中方的数据不真实，鼓动国际社会对中国进行追责索赔，还叫嚣要对中国进行调查^[26]。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妄说中国是在借“抗疫”输出中国制度模式，争夺地缘政治影响力，甚至诬称中国援助“抗疫”是在为新冠疫情的扩散“赎罪”，试图破坏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2020年，《华尔街日报》刊发诋毁中国政府 and 中国人民抗击疫情努力的相关报道，并加上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标题，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国际社会广泛谴责^[27]。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肆意抹黑中国，在没有任何调查论证和事实依据的前提下将中国定义为此次疫情的发源地，并对中国取得的抗疫成果置若罔闻、视而不见，对中国防疫策略和管控措施横加指责、指手画脚。西方不仅仅是在新冠疫情问题上抹黑中国，在各方面都在试图寻找抹黑攻击中国的机会。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埃斯珀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大肆攻击抹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政治制度及内外政策，向全世界散布政治谎言，在台湾、涉港、南海等问题上无端指责中方^[28]，表现出无知、偏见和虚伪。

（二）西方民众对中国存在偏见

长期以来，在涉及中国的国际舆论中，总是充斥着西方国家的种种偏见，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并非一日形成。同时，由于缺乏民间交流，部分国外网民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一些过往的影视作品，这些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与当前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相吻合。西方社会和一些民众对我国缺乏正确的认识，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的国家形象产生误读，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信息传播渠道不畅。除了读报纸或看那些到过中国的游客的记述，他们也没有太多的其他渠道得到关于中国的真实信息，而那些走马观花的游客没能力理解他们看到的東西。美国人之所以

对中国持有偏见,一定程度上在于西方作者传递给他们的中国形象是不准确的^[29]。二是政治与意识形态差异。欧美很多人对社会主义抱有成见^[30]。三是经济原因。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于是某些美国人士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对美国的“独强”构成威胁,并对中国的崛起抱有强烈的危机感^[31]。

(三) 西方媒体对舆论垄断性较强

西方主流媒体基本上掌握了当今国际涉华舆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这些媒体所传播的中国形象以及传播中国形象的方式,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受众关于涉华舆论的视听和认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32]。由于 YouTube、Facebook、Twitter 等著名国际社交平台在全世界范围内有着难以替代的市场,国外民众想要了解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会优先选择这些平台。有学者通过分析部分视频报道发现:那些受到中国媒体正能量激励的受众对中国抗疫成果发表正面、积极的评论居多,而发表负面评论的受众则与西方媒体的消极误导存在一定关系。这充分说明受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引导,进而直接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树立^[33]。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有所提升,但“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尚未被打破。当前,由于国际社交媒体的舆论影响力较大,我国主流媒体在国外的影响力受限,面临着“传而不通”的尴尬局面。我国媒体拥有与西方一流媒体相差不大的全球覆盖率,但却未拥有较高的国际受众接触率、落户率、收视率、收听率、收读率^[34]。

(四) “抗疫”报道的题材及方式有待改进

在国际舆论场上出现大量有损中国形象报道,对此,中国相关官方机构、对外宣传媒体等公开予以驳斥,坚决反对。但是,来自民间的声音却相对偏弱,也未能与官方媒体形成充分的呼应与配合。在我国抗疫过程中,从医生到护士、从志愿者到军人……涌现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媒体应以一种更加接地气的方式向外界报道这些人与事。例如,在国内疫情暴发的早期阶

段,相关视频报道多数都集中于宏观层面的政策和指导,以及疫情的整体概况等方面,较少有普通民众的视角。“小人物”的生活不仅容易引发广泛共鸣,更能折射出“大时代”下的社会变迁,而且能体现当代普世价值^[35]。例如,日本导演竹内亮于2020年3月拍摄了《南京抗疫现场》,这部纪录疫情期间南京防疫工作、普通人生活的视频登上了日本雅虎网站首页。2020年6月26日晚,竹内亮的新纪录片《好久不见,武汉》上线。这部接地气、平民化视角的纪录片聚焦疫情后武汉逐渐恢复正常的日常生活,纪录片在微博上线不到一天,播放量已经超过1500万次。

三、新冠疫情事件下华侨华人宣传中国国家形象的策略

(一) 加强在西方国家主流媒体上的辟谣力度

要想发出中国声音,宣传国家形象,加大对外国媒体抹黑中国的辟谣力度是重中之重。只有对国外媒体所造谣言给予坚决彻底的反击和驳斥,才能让国外广大民众了解到中国的真实情况。长久且有效的国家形象宣传是建立在民众对事实情况有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众多西方反华媒体对中国的污蔑抹黑站不住脚,很容易被推翻。广大华侨华人了解中国和所在国的政治、社会情况,能够游刃于中外文化之间,并深知国外公共舆论的运作规则,他们是准确塑造和维护中国国家形象不可替代的积极力量。因此,华侨华人应当从话题选择、事实选择、框架效应等角度,在主流媒体上呈现真实的新冠疫情事件下的中国国家形象。

(二) 充分发挥互联网媒体的传播功效

新冠疫情暴发使受众对及时、准确的信息需求猛增,消息传播及时性和真实性显得更加重要。西方国家民众可以通过在线平台迅速获知有关中国抗疫的报道。互联网媒体能融合传播优势,及时准确披露相关信息,传播中国声音,生动报道联防联控主要成效,讲述抗疫一线感人事迹,聚焦国际社会的关注和积极评价。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互联网媒体促进中国

与世界各国相互了解,塑造真实的中国国家形象。《武汉莫慌,我们等你!》译制成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俄文、阿拉伯文、日文、韩文、缅甸文、印尼文、泰文和世界语等版本,通过中国网、融媒体中心及 Facebook、Twitter、YouTube、Instagram、Naver、VK 等平台,用 12 个语种、58 个账号发布,覆盖受众千万人次。国家外文局编辑湖北省一线记者采访素材,利用海外社交平台账号对外报道。海外华侨华人是促进中外交往的纽带,也是外界感知中国的重要媒介,华侨华人可以在国外互联网媒体上真实地宣传中国国家形象,推动中国与侨居国良性互动。海外华侨华人作为精通汉语和外语的群体,能够以准确高效和生动的方式方法将国内的抗疫故事传播给国外民众。

(三) 加强与国外电视媒体的合作

电视作为目前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媒介之一,在建构国家形象的过程中有着自身优势。例如,声像传播在诉诸情感、建构认同感方面见长,能够潜移默化影响公众态度。华侨华人了解当地民众的口味喜好以及流行的电视频道,因此,华侨华人和当地电视媒体合作对于推动中国国际传播格局的变革具有积极作用。华侨华人可依据当地电视媒体对民众的影响力,选取合适的电视台作为传播渠道,在国外民众较为喜欢的节目中展现更多华侨华人的身影,并在合适的场合下,做好有关中国抗疫、援助当地以及两国友好关系的宣传,让国外民众逐步了解更多更真实的中国。同时,华侨华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来自当地民众的反馈,助力国内相关方面打造国外民众喜爱的电视节目。另外,可以充分发挥侨团组织、有关商会的作用,邀请相关知名电视媒体采访当地中国商会会长等代表性人物,有针对性地解决国外主流传统媒体对中国不实报道的问题。

(四) 加强侨胞与当地民众的沟通互动

华侨华人熟悉中外文化,有助于搭建中外人文交流网,推动彼此深入了解、友好共处。同时,他们也能全方位展示中国的正面形象,有效消除

外界对中国的误解。风雨同舟共抗疫,爱无国界肩并肩,华侨华人身居海外,可以在持续支援当地抗疫的同时,加强与当地居民的沟通交流与互动,并积极宣传中国的抗疫事实与情况,把中国的新变化和新经验推向国际社会,积极在海内外发声,提供获取全球防疫信息的可靠渠道,激发战疫正能量,助力构筑疫情防控国际共同体,从而赢得国际民众对中国人民的支持。例如,阿根廷侨界抗疫工作委员会筹集了爱心捐款,购买各种防疫物资捐赠给当地政府。侨界抗疫工作委员会帮助阿根廷社会抗击疫情的举动,赢得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赞誉。

(五) 提升抗击疫情成果报道的说服力

华侨华人在海外传播国家形象的努力离不开有说服力的抗疫成果。中国经济活动逐渐恢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取得新进展,在短时间内遏制了病毒的传播,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贡献,并在相关药物、疫苗、检测试剂研发上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国在奋力抗疫的同时,华侨华人也应该积极地将这些强有力的成果展示出去,以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与其他国家分享信息,开展科研合作。例如,中国向津巴布韦、巴基斯坦、塞尔维亚和古巴等国家提供疫苗援助,这一雪中送炭的举动在当地取得了较好的反响,得到当地民众的赞誉,此类行动有助于提高抗疫成果报道的说服力。华侨华人应充分展示中国政府在医疗救助、对外援助、复工复产、公共卫生管理、应急保障等方面的努力和相关成就。在此过程中,让更多普通人出现在镜头和话筒前,让老百姓讲述自己直面灾难时的举动与感悟,使报道更接地气、更有说服力。华侨华人可以选取在抗疫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等知名医生,传播他们的权威声音,以赢得了中外舆论的认可,进而提升抗击疫情成果报道的说服力。

四、结语

新冠疫情对中国来说是一次重大危机,对全世界来说也是一场空前的巨大灾难。中国以自己

的行动展示了大国的形象与担当。把抗疫这一国际社会重大议题作为当前中国声音走向国际的最重要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厘清国外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以华侨华人作为重要沟通桥梁,全面推进新冠疫情事件下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不断开创当代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 [1] 葛岩,秦裕林,徐剑.作为图式的地域形象、结构、功能和测量[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2):19-37.
- [2] 罗幸,汤晓山.中国国家形象在东盟:基于2017年的数据调查分析[J].现代传播,2018(11):19-24.
- [3] 张昆,王创业.疏通渠道实现中国国家形象的对外立体传播[J].新闻大学,2017(3):122-130、152.
- [4] 单波.论国家形象跨文化转向的可能性[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32-36.
- [5] 陈先红,江薇薇.中国春节故事对外传播的 USP 理念与策略分析[J].传媒,2018(15):61-64.
- [6] 张昆,陈雅莉.东盟英文报章在地缘政治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建构——以《海峡时报》和《雅加达邮报》报道南海争端为例[J].新闻大学,2014(2):72-82.
- [7][12] 张昆,王孟晴.中美两国公众眼中的日本与德国形象[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77-84.
- [8] 葛岩,赵海,秦裕林,等.国家、地区媒体形象的数据挖掘——基于认知心理学与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视角[J].学术月刊,2015(7):163-170.
- [9] 赵月枝.重构国际传播体系的中国贡献[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4-01(B1).
- [10] 张昆,张铁云.“共识”与“共识的程度”:国家形象认知的别种维度[J].现代传播,2019(6):68-72.
- [11] 刘峰,徐康宁,王美昌.出口、对外投资与中国国家形象:来自拉丁美洲的证据[J].国际贸易问题,2019(2):15-28.
- [13] 辛文娟,黄杰,赖涵.受众对国家形象广告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中国大学生对日本国家形象广告的认知实验为例[J].情报杂志,2016(4):204-207、151.
- [14] 张昆,王宇婷.中美两国公众心中目的日本国家形象——基于2016年中美两国的全国性民意调查[J].新闻大学,2018(5):124-134、144、152-153.
- [15] 陈勇,张昆,张明新.大众媒介接触对美国民众中国国家形象认知的影响[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183-188.
- [16] 吴献举.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形象跨文化传播的路径选择[J].中国出版,2019(12):3-7.
- [17] 陈正辉.新全球化视野下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J].社会科学文摘,2018(2):10-12.
- [18] 张璩尹.网络言论传播与国家形象在年轻一代的良性内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7):166-170.
- [19] 梁云,张森森,佟毅.社交媒体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形象分析——基于社交网站 VKONTAKTE 的中国报道[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128-136.
- [20] 严燕蓉,韦路.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现状与核心议题[J].新闻与写作,2018(6):29-34.
- [21] 沈霄.“看”中国:作为“他者”的国家形象建构——基于 Facebook “中国文化”系列短片的文本分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146-154.
- [22] 袁赛男.论习近平国家形象思想[J].社会主义研究,2017(2):1-7.
- [23] 邓路.国家形象、交易信任与出口持续时间——来自中国产品层面的证据[J].当代财经,2018(10):14-23.
- [24] 高晓虹,蔡雨.践行媒体使命、彰显责任担当、服务抗疫大局——主流媒体抗疫报道以回应关切提升新闻舆论工作有效性[J].中国记者,2020(4):70-74.
- [25] 史安斌.西方媒体的“选择性不闻”[N].环球时报,2019-12-10(15).
- [26] 2020年5月8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EB/OL].(2020-05-08).<https://www.fmprc.gov.cn/ce/cesg/chn/fyrth/t1777144.htm>.
- [27] 2020年2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网上例行记者会

- [EB/OL].(2020-02-19).<https://www.fmprc.gov.cn/ce/cesg/chn/fyrth/t1746865.htm>.
- [28] 2020 年 2 月 17 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网上例行记者会 [EB/OL].(2020-02-17).<https://www.fmprc.gov.cn/ce/cecz/chn/xwyd/fyrth/t1745873.htm>.
- [29] 唐海东. 异域情调·故国想象·原乡记忆 [D]. 上海: 复旦大学, 2010.
- [30] 郑云天. 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话语体系探析 [D]. 北京: 清华大学, 2014.
- [31] 王思齐. 国家软实力的模式建构 [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1.
- [32][34] 吴立斌. 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 [D].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 [33] 董雁, 于洋欢. 外宣媒体的战“疫”报道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以 CGTN 为例 [J]. 传媒, 2020(11): 42-45.
- [35] 廉同辉, 李春雷, 袁勤俭, 等. 文化“走出去”视角下数字出版内容创新研究 [J]. 学术论坛, 2015(2): 76-79.

责任编辑: 吉强

更好发挥新时代统一战线法宝作用： 历史方位、经验启示、开创新局

罗 彪

摘 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坚持统一战线作为党在百年奋斗中所积累的十个方面的宝贵经验之一，确立了统一战线在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的重要地位。新时代继续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有必要在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中有效总结经验，结合时代要求和时代使命，从构建好大统战工作格局、实施好新型政党制度、融入好国家治理、实现好大团结大联合等方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发挥作用。

关键词：统一战线；法宝作用；历史方位；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1-00031-06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十个方面的宝贵经验，其中包括坚持统一战线的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在创立之初，就与统一战线密不可分。在中国共产党 18 岁“成人礼”之年，统一战线被冠冕为党在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并被毛泽东同志列为首要的法宝。毛泽东同志在 1925 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充分地认识到，要弄清楚什么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和谁是我们的朋友的问题。在既斗争又联合的过程中、在大团结大联合的本

质追求中、在统一战线工作现代化的进程中，“敌人和朋友”的问题既是始终存在的问题，也是始终归结为关注“人心”和“力量”的策略或战略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共产党人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统一战线新观点新理念新理论，为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顺利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主要任务提供了重要支撑和保障，也必将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提供各方面的支撑和保障。

收稿日期：2021-12-07

作者简介：罗彪，中共梅州市委党校、梅州市社会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 2020—2021 年度全省社会主义学院系统招标课题“统一战线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功能优势和策略审视”（2020-GDSYKT-03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统战事业路线图和“历史方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指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始终把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摆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营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1]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七一”讲话中也强调：“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2]统一战线工作贯穿在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区域执政到全面执政的全过程，其间对统一战线的认识从模糊到清晰，从不懂得如何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到积极争取和主动掌握领导权，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统战事业路线图上画下了曲折和成就，但路线图上的“方位”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始终把统一战线放在重要位置，统战事业始终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原理，始终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画下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起点。先后经历了民主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解放战争阶段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所以，毛泽东同志说：“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3]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跳出了成立之初对统一战线的片面认识，也摆脱了“左”和“右”的影响。在抗日战争阶段，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呼之欲出，通过建立“三三制”政权赢得了大多数中间阶层的支持和拥护。在解放战争阶段，中国共产党通过多项土地改革的改革，进一步巩固了工农联盟，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寻求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支持和认可，通过“五一”口号的发布，主张与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等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最广泛地团结了各方面的阶层

和人士，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新中国提供了最有效的保障。统一战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被证明是可行的。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画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性质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虽然在人民民主的性质上未发生变化，但在其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以及制度属性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面对这种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4]统一战线不仅助力新生的人民政权顺利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转身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一部分，成为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为更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采取各项措施帮助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提出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动员他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画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进入新的时期，统一战线也随之发生战略性变化，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新时期的统一战线确定为“爱国统一战线”。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统一战线的地位、作用、范围对象、制度体系的构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和重视。党的十六大后，中共中央先后出台了关于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推动统一战线事业向规范化和制度化迈进。党的十七大把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列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强调“促进五大关系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5]。统一战线在这段时期也经历了国内外形势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但也是这些变

化促使统一战线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突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画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断巩固和发展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变化大，越是要把统一战线发展好、把统战工作开展好。”^[6]着眼于不断加强和改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以实际行动推动全党共同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局面，进一步推动统战工作迈向规范化、制度化和现代化。制定了统战领域的基础性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为新时代统战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调整优化了涉统部门的机构和职能，首次明确了统战工作的基本原则，强化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治协商中的作用，进一步拓展了统一战线的范围，把“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增加到统一战线的联盟中，把统战部门自身的建设当作重要议题开展，形成了大统战工作格局，为有效实现中华儿女大团结大联合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广泛更为坚实的力量支持。

二、中国共产党百年统战事业的经验启示

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所取得重大成就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贡献，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属性所决定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从登上历史舞台和政治舞台时就强调自身的联合和同盟军的联合；也是统一战线自身的作用和优势所决定的——能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了统一战线的独特优势，创造性地提出了统一战线是克敌制胜的主要法宝。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在各个历史时期得到不断巩固和加强，有力保障了各个历史时期主要任务的完成，积累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并给人深

刻启示。

第一，始终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统战工作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统战事业的根本性经验。国民大革命时期，尤其是国共合作之初，中国共产党还不善于同强大的同盟军打交道，也还不懂得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也认为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是为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抬轿子”的，不要去争领导权。不断的退让反而使局面被动，合作破裂。土地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左”倾关门主义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拒之门外，以狭隘的方式拒绝了领导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重要性，牢牢掌握领导权，以斗争求合作求团结，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实践充分证明，越是牢牢抓住领导权，越能顺利有效完成任务使命。李维汉同志曾指出：“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实行坚强正确的领导，是中国统一战线的最根本的特点，也是中国统一战线得以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最基本的保证。”^[7]

第二，始终坚持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种初心使命也映射在统一战线中。1930年9月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8]。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通过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深化了工农联盟关系，壮大了革命队伍。在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合作共事上，中国共产党积极争取支持和认可，于1956年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并于党的十二大上拓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真心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与民主党派坦诚相见、坦诚相待。改革开放时期，真诚邀请和欢迎港澳台海外人士回家乡投资，共同发展实业、建设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

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9]。统战工作的根本就是人心问题，就是寻求各种力量齐头共进，以应对各种挑战和风险，以开启新征程取得新成就。

第三，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战线在作用发挥上始终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把尽可能多的人和力量有效团结与组织起来，起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作用。国民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农民运动，积极动员、组织广大群众支持和参与北伐，既给北伐有力支援，又壮大了自身的力量，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一支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改革开放时期，为了让更多的社会资金和人才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工商界“五老”，提出“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要为改革开放服务。新时代，统一战线更要围绕中心，奋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好服务。

第四，始终坚持统战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不同历史时期，为更好服务中心任务和提升统战工作效能，统战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始终与时俱进，进行创新，形成不同的特点和面相。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是为“革命”服务，统战的理论和实践主要立足于阶级关系和内外民族关系，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排斥”、日本民族和中华民族的“侵略—反抗”的关系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今天，统一战线主要是为“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服务，统一战线的“阶级联盟”转变为“政治联盟”，统战工作的性质和地位都发生了较大变化，统战工作的范围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针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两个健康”论和新型政商关系理论，针对民族宗教工作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法治理民族宗教事务，以及大统战工作格

局等重要理论，这些都为新时代做好统战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

三、开创统一战线事业新局面，助力护航新时代

从百年统一战线事业中看清楚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和巨大成就，才会更加坚信统一战线的不可替代和独特优势。新时代，统一战线所涉及领域的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都远超过去，要努力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指引下，更好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作用，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更好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

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统一战线是全党的工作，需要由全党共同来做，同时又需要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做好牵头协调工作。大统战工作格局为统战工作构建了组织体系、职能体系和制度体系，也是一种观念的变化，是用全域的、长远的眼光做好统战工作。在这个格局中，党的领导是根本，这是党和统一战线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也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统战工作的应有之义。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被明确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内容之一。这全面强化了党是领导一切的，也全面强化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力量，与统一战线的政治属性和政治立场是高度一致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一”与统一战线多元主体的这个“多”，就是通过领导关系联系起来，“一”与“多”之间越通畅越有效，凝心聚力则更突出。这种通畅对新时代的统战工作而言，就是要在大统战工作格局中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始终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上而下不走样不变形，有效处理好党总揽全局

与协调各方依法律法规政策执行的关系，激发统一战线各方的主观能动性。党的领导同时又是具体的，体现为地方各级党委对统战工作的主体责任：一方面，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统战工作始终；另一方面，地方各级党委尤其是党委主要负责人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要求，带头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带头参加统一战线重要活动，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牢牢把握统一战线的主动权。

在新型政党制度中更加注重照顾同盟者利益，有效提升政治协商能力。新中国政权是从政治协商中走出来的，在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政党关系历来是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民主党派认为自身的任务已经完成，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就非常痛惜救国会的解散，并劝阻了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的解散。现在的民主党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中国共产党执政需要这样的参谋和帮手，大家坚持真协商、真合作，真诚相待，实现执政与参政、领导与合作、协商与监督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贴心暖人，切实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排忧解难，全面考虑、全盘统筹同盟者不同的诉求和需求，要积极支持各民主党派履行参政议政等职能，让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来。新时代对同盟者利益的照顾和保障，要巩固以往的工作成果，既要照顾好同盟者的政治利益，也要照顾好同盟者的物质利益。要贯彻落实好《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发扬好政治协商这一传统优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中结出更多更大的智慧成果。积极照顾好同盟者的物质利益，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能、建言献策提供充分的物质保障。同时，要更加重视同盟者的组织价值、个人价值的实现，积极支持各民主

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其他同盟者在其章程范围发挥知识优势和技能优势，促其实现更高层次的“利益需求”。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融入统战优势，构建治理共同体，提升治理整体效能。统一战线和国家治理在诸多方面都存在契合性，这种契合性使得统一战线的众多优势可以迅速转化为国家治理的优势，统一战线的人才智力、共识倾向、制度载体和决策优化等优势都能为国家治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汇集智慧，这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最需要的。邓小平同志曾说：“搞现代化建设，最重要的是知识和人才。我们最大的弱点恰恰在这里，知识不足，人才不足。”^[10]国家治理是一个涉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复杂综合体，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下到上凝心聚力，共同努力。新时代，要有效构建治理共同体，从主体、平台、制度、措施、方式、保障上进行全方位的构建，要强化党的领导、完善法治、加强科技保障。要更加注重发挥统一战线在基层的作用，把智慧和力量融入社会基层治理当中，壮大基层治理力量，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提供厚实的力量。

在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中实现大团结大联合，始终处理好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服务国家治理和民族复兴。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 strategy 和战略。对这种策略和战略，要有充分的自信，要有系统规范的机制保障，这一过程就是统一战线守正创新的过程。要结合新形势新要求，推进统一战线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要针对世情国情的“难梗阻”加大研究，多求突破。要正确处理好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一致性是统一战线的根本，不断增强统一战线的一致性才是有效的途径，要持续巩固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在求

同存异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多样性也不可忽视,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是一种客观规律,规律是不能违背的,要分类施策,做好引导,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过增进共识和认同减少分歧,在和而不同中实现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凝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共同力量。

参考文献:

- [1][6] 习近平.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EB/OL]. (2015-05-20).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0/c_1115351358.htm.
- [2]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B/OL]. (2021-07-01). <https://www.12371.cn/2021/07/01/ART11625122624003841.shtml>.
- [3] 中央统战部政策理论研究室. 统一战线教学学习文献 [M]. 北京: 开明出版社, 1999: 184.
- [4] 毛泽东文集: 第 6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81.
- [5][8] 中共中央统战部, 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等. 中国统一战线教程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67、33.
- [7] 李维汉. 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统一战线 [J]. 红旗, 1983(24): 14.
- [9] 人间奇迹: 消灭绝对贫困留史册 [EB/OL]. (2021-07-01).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1/07-01/9510718.shtml>.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思想年谱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319.

责任编辑: 吉强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价值审视与实践逻辑

鲍跃华

摘要: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是民主党的组织基础、工作前沿和发展源头,是团结引导成员和联系社会的纽带,是履行职能和发挥作用的支撑。新时代加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必须坚持政治主导、责任基础和质量优先的价值原则,精准识别基层组织存在问题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的主流和枝节、问题的性质和程度等,进而从制度要求、组织属性、现实发展等方面分析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突出问题以及问题成因,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强基层组织的政治功能、健全基层组织的制度体系、创新基层组织的工作方式和提升基层组织的组织活力。

关键词: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发展目标;现实问题;实践对策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1-00037-12

由于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作特点和民主党派组织建设的态势,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问题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实际工作者和理论界的足够重视。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重要性提升,基层组织建设在参政党建设整体体系中的作用愈发显现。在此背景下,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成为参政党建设实践中的着力重点,成为加强参政党建设、提升参政党建设质量的关键所在。

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发挥民主党派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制度效应和现实价值。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完善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能方法,展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1]。在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

为治理效能的过程中,民主党派的作用发挥在其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而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对于民主党派作用发挥有着关键性影响。一般而言,政党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组织体系的系统功能输出。民主党派作为一个政党组织,是由明确目标、组织结构、权责分配和人员安排等结合而成的一个有机系统。而基层组织是反映民主党派组织活力、彰显组织优势、体现组织功能的基础和承载,其建设质量关系着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和作用发挥的全局,关系着多党合作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基。因而,审视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现状和趋势,加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已然成为发挥民主党派积极作用和多党合作制度完善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的现实课题。

收稿日期:2022-01-08

作者简介:鲍跃华,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二级调研员,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与中国政治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统一战线工作研究重点课题“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问题与对策”(2021JSTZC001)的研究成果。

一、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价值审视

问题是研究的先导,强烈的问题意识既是研究深入的关键,更是研究价值体现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们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2]通常来说,问题源于实践与理论的脱节、现实与目标的背离。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变革进程中,理论与实践、现实与目标的差异是一个可以预见的常态。如何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发展不同现状的情势下构建一个具有广泛共识性和实践性的发展目标,使得各方能够有效接受、普遍遵循就成为审视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科学合理界定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发展目标,坚持目标导向,既是审视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存在问题的价值判准,也是有效解决基层组织建设突出问题的科学路径。与先发国家现代化的自发过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和推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以高度的历史主动通过制定具有前瞻性的科学战略和明确目标,团结和带领全体人民完成现代化的各阶段性任务,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问题。问题意识和目标导向的融合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这种属性源于对现代化规律的深刻把握。

“现代人既相信变化的可能性,又相信变化的可取性。他们具有信心,认为人类有控制变化的能力,并以此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3]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的进程更在于对政治使命的高度自觉、对人民美好生活追求的价值信守。没有对人民幸福的价值坚守,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效地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也就难以达成美好生活的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党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天下为公,人间正道,这是我们党具有历史自信的最大底气^[4]。

事实上,“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5]。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发展目标生成于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需要,这种实践需求背后是对多党合作价值诉求的回应。长期以来,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共同奋斗,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形成了通力合作、团结和谐的新型政党关系^[6]。新型政党关系之所以成为新型政党制度的构建基础,不仅在于团结奋斗的合作进程,更重要的是与其蕴含的价值理念紧密关联。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民族劫难背景下,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的奋斗目标。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发展目标的确立过程中,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理念擘画出多党合作的“先天构架”,并且这一“先天构架”对制度主体的其他目标形成产生了多重形塑。从民主党派的政治身份和基本属性来看,建设规范且富有活力的基层组织,应该坚持政治主导、责任基础和质量优先的价值原则。这是为更好地履行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满足参政党组织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发挥参政党作用的内在要求。因此,新时代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应以参政党政党属性、参政党能力提升和参政党作用发挥为基点,弄清楚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发展目标。

(一) 增强政治大局意识

政治大局意识是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政治前提和生命线,也是民主党派组织属性的必然要求。就基层组织政治属性而言,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组成单元,是承担多党合作使命和任务的前沿阵地,确保多党合作事业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发展是其组织建设的根基。坚守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行是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发展的根本政治原则,构成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出发点。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指出,各民主党派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引导广

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始终保持同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政治本色^[7]。对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来说,增强政治大局意识既是其组织建设的基本依据,也是组织发展的迫切要求。基层组织建设是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中进行的,且与党和国家大局密切相关。但是,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由于较少或间接地参与多党合作实践,对组织政治属性缺乏直观的真切体验,往往容易忽略其中心和全局工作。因此,加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更需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参政党意识,把握时代脉搏,心怀“国之大者”,不断巩固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将自身发展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不断提高政治大局意识。

(二) 彰显党派特色优势

党派特色是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实践基点,也是民主党派存在和发展的最大底气。就基层组织的组织属性而言,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是各自党派特色的微观缩影,是人民群众感悟多党合作优势和党派形象的直观窗口。我国各民主党派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构成了各民主党的界别特色。这些界别特色既是各民主党派社会形象的典型标识,也是各民主党派发挥独特优势的组基础。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是延续党派特色血脉、保持党派特色优势的前沿关口和主要源头。只有从基层组织源头守牢党派的特色血脉,才能更好地发挥民主党派引导所联系群众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才能更好地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三) 提升组织建设质量

组织质量是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基层组织建设的活力源泉所在。事实上我国民主党派的存在发展从来就不是依靠成员

数量实现的,质量优先一直是其组织发展的独特逻辑。作为主体是知识分子的民主党派,其组织质量的依据主要看代表人士的作用。民主党派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培养了一大批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亲密合作、经得起考验的代表人士,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完善作出了积极贡献。进入新时代,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和使命,对组织建设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还是统筹深化改革开放和应对外部压力,都对民主党派的履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层组织建设需要把握质量提升的根本标尺,从源头和基础上增强质量优先的意识,确保多党合作事业始终能够朝气蓬勃、生机无限。

(四) 体现组织价值功能

组织功能是组织价值的外化,是组织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和基础。任何组织的诸种过程通常都意味着在价值功能目标指引下对组织成员行为及其互动进行塑造和协调的集体行动过程。新时代,民主党派的舞台更加广阔、责任更加重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使命和价值追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实践要求。从我国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具体功能来看,发展、引导和组织成员并将其融入民主党派的组织体系进而参与多党合作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力量行为过程是其最核心的任务,也是其组织价值的本质体现。民主党派担负着把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有效落实下去,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智慧和力量有效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基层组织承担参政党职能的基础性工作,具有天然的贴近社会优势,民主党派真正有效履职尽责,切实发挥参政党作用,越来越

需要工作重心下沉，激发基层组织作用。

二、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现实呈现

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过程中，价值判断的发展目标是比较便捷的突破口，虽然直接表现为组织行为的预期，但实际是对原有组织建设问题的一次重新检视和创新。从价值层面审视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发展目标犹如画家的图像优雅动人，但价值判断如不“加以论证和说明”，则难免显得过于幻境。休谟曾言：“没有了解剖学家的帮助，要想在绘画方面有优异的表现，那甚至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对于各部分以及其位置和联系有一种精确的知识，然后运笔布局，才能优雅正确。”^[8]所以，在加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过程中，不仅需要发展目标的引领，还需要对现存问题的辨认和破解，从而推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重视和支持下，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取得了很大发展，各民主党派将基层组织建设作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着力点，基层组织的设置和运作逐步规范。各地涌现了一大批民主党派先进基层组织和优秀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创造了许多实用性、针对性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经验。同时，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仍然是整个组织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组织建设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带有普遍性的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我们及时关注并深刻体认。

（一）思想政治引领作用发挥不充分

思想政治引领是基层组织最基本的任务。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作为实现党派政治纲领的组织基础，是引导组织成员和所联系群众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直接平台。鲜明的政治导向是民主党派参政政治属性的集中反映，是民主党派实现政治使命的必然要求，也是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首要政治任务。加强对成员的思想政治引领，自觉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共同理想信念，激发成员的爱国奋斗精神，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是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核心主题和政治底线。

从基层组织的思想政治引导来看，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已经由过去的临时性选择行为转向统领性常规工作，对思想政治引导的重要性认识有了较大提高。但基层组织的思想政治引导作用发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自身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站位有待提高，对多党合作的思想政治基础理解不够深入，甚至不同程度上存在忽视或规避政治导向和思想引导的倾向，对组织成员思想引导的制度落实和作用效果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思想政治工作主动性、自觉性不够。很多基层组织对强化理论武装、加强政治理论学习、进行自我教育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够，政治学习热情不高。有些基层组织成员认为民主党派不是执政党，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可以有所降低，政治理论学习不需要像中共那样严格要求、学深悟透。从相关调查来看，只有极少数基层组织坚持每月集中学习一次，很多基层组织每年集体政治理论学习的频次少于4次，成员参与率不到50%，甚至不少基层组织每年仅象征性地聚会一次。而且，基层组织学习频次越高，成员参与率越低，有的成员甚至常年不参加所在组织集体学习活动。

基层组织思想引导内容和形式单一、针对性不强。近年各基层组织不断探索利用新媒体、读书会、演讲比赛等形式创新集中学习、自我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但大多基层组织思想教育仍以传统的学习座谈为主，缺乏思想政治引导的明确目标，缺乏对广大成员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和认知特点变化需求的回应，缺乏与党派优良传统教育的有机结合。一些基层组织还没有能够摆脱传达文件、学习报纸的简单做法，有的基层组织的学习创新也只是形式上的变化。

基层组织思想引领工作能力不强。有些基层组织领导班子理论素养有限，理论指导不足，不能准确把握民主党派成员思想引导的主动权，面对广大成员入党动机多元、思想活跃等状况容易失去话语主导权，不能进行有效的解疑释惑和思

想交流,学习中收获不大;有些基层组织思想引导主题不鲜明,主题学习活动思想引导缺失,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并不能与成员思想产生共鸣,也没有与成员履职实践有机结合,难以引起成员学习兴趣;有的基层组织领导责任担当不够,示范引领作用不足,主旋律和正能量不彰,难以保证思想引导的作用效果。

(二) 人才队伍建设质量不高

人才是第一资源。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重视培养人才、团结人才、引领人才、成就人才,团结和支持各方面人才为党和人民事业建功立业^[9]。民主党派代表人士是党和国家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力量。大力团结并培养使用优秀民主党派代表人士,是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方面,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政治保障和人才支持的重要内容。发展、教育、管理成员是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重要职责,是各民主党派章程对基层组织基本任务的共性规定,也是保持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和民主党派组织活力的重要保障。

调研表明,当前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发现、培养人才,特别是系统推进代表人士和后备干部建设方面都不同程度上存在重视数量、忽视质量,重视发展、轻视培养等方面问题,造成基层组织人才队伍建设总体质量不高、代表性人士和后备干部储备不足的状况。

基层组织发展成员目标模糊。民主党派发展成员是一项严肃认真的政治工作,是为多党合作事业长期发展提供人才支持的组织保证。发展为了工作和在工作中发展是其首要组织原则。很多基层组织对民主党派发展成员的目的认知不足,对我国各民主党派发展成员的重点分工和政策规定缺乏科学理解,在组织本位主导下存在盲目追求数量、扩展组织规模的冲动,甚至存在不顾成员个人意愿,硬拉生抢发展成员的现象。有的基

层组织负责人利用自身职务影响或资源优势进行“近亲繁殖”。某公司老总,在本公司发展30多名同一党派新成员,几乎把该公司的中层干部全部囊括。很多党派成员加入民主党派只是因为朋友关系或情感满足,很多成员入会前完全没有对民主党派的历史认知和政治认知,只是为了去结识朋友,扩大“朋友圈”,甚至有的成员加入党派后发现自己朋友不在这一党派而要求更换党派。

基层组织发展成员的标准不能很好落实。民主党派发展成员具有严格的政治标准,“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认同”构成了民主党派代表人士的基本标准。但在实践中,一些基层组织在成员发展工作中片面追求高学历、高收入、年轻化等,用“能人”“富人”“好人”标准代替会员标准,曲解标准,一味吸收带有“人才称号”的知识分子、机关事业单位的中层干部以及拥有资本优势的私营企业主等人士,而忽视或淡化对他们思想政治素质、参政议政能力、群众基础等方面的全面考察,不注重严把组织入口关,不严格执行成员入会程序,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党派特色,加剧了各党派趋同化的现象,影响了民主党派成员队伍结构的优化。

基层组织对成员教育管理不严格。很多基层组织管理松懈,组织生活制度不健全,对成员的教育管理手段落后,教育管理虚化,甚至放任不管,以致存在大量的“档案成员”或“僵尸成员”;一些基层组织对成员缺乏综合考评的科学评价制度,主观随意性大;一些基层组织对成员的培养和推荐不重视,对民主党派代表人士的成长规律认识不到位,对民主党派人才培养管理机制简单化理解,没有形成科学系统的成员发展年度计划和长期规划;有的基层负责人缺乏人才队伍建设责任意识,不重视后备人才的培养和推荐,致使成员队伍结构老化,有些基层组织退休成员人数占50%以上,有的基层组织平均年龄超过58岁。

(三) 组织团结凝聚能力不强

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激发活力,是民主党

派组织建设的内在规律,也是提升参政党能力建设的重要保证。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是团结凝聚广大成员的纽带,是组织成员进行党派工作的前沿阵地,其组织内部凝聚力的状况直接关系到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优势和整体功能作用发挥。

调研发现,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对自身政治功能的认识并不充分,组织对成员的吸引力和约束力都有限,整个组织体系松散,凝聚力不强,大大影响了成员积极性、创造性的调动和集智聚力功能的实现。

缺乏有效凝聚组织成员的行动目标。行动目标是政治功能的具体体现,是更加有力地保证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制度在基层落实落细的现实需要。基层组织对自身参政党政治属性领悟不深,对参政党政治角色缺乏清晰理解,不善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来谋划工作,不能很好地融入所在地区和单位的中心任务,不能将年度工作计划、贯彻上级重大决策同本地区、本单位中心工作有机衔接,形成有效凝聚成员、调动成员积极性的组织目标和组织计划,进而造成组织工作与中心任务的脱节,容易陷入被动应付或自娱自乐的怪圈,对成员参与缺乏长期持续吸引力。

缺乏有效凝聚组织的制度规范。制度是达成团结凝聚的根本保障。从实际情况来看,多数基层组织制度建设不健全,落实不到位,纪律意识淡薄。制度建设缺乏适合自身特点的相应科学规范和有效的落地运行机制,很多制度规范不具有实施价值或者执行不下去,导致制度成为挂在墙上的“装饰物”或随意揉捏的“橡皮泥”,对于基层组织实际工作不能起到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极大地影响了基层组织的凝聚力。

缺乏有效凝聚组织的民主氛围。民主是实现团结凝聚的有效方法。很多基层组织在日常工作中不能坚持民主集中议事原则,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内部民主氛围不足。基层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大多属于所在行业或专业业务骨干,且班子成员

分属于不同单位、行业,本职工作任务较重,平时缺少交流和沟通,与组织成员的联系与交流也不密切。有的基层组织负责人缺乏党派工作经验,对多党合作的政策和要求了解不够,对党派历史和工作规律掌握不深,其自身的领导素质和组织管理能力相对较弱,导致一些基层领导工作中不能主动思考,遇事存在被动应付上级组织任务或主观任性的应景作为等情况,容易出现将业务与基层组织建设割裂或等同两个极端,甚至出现党派工作行政化、领导班子作用个人化、领导职务荣誉化、成员关系庸俗化的现象,致使组织内部缺乏团结向上的氛围,导致成员享有权利不到位,往往造成很多党派成员对组织的疏离和冷漠,认同感和归属感下降,难以达到团结成员、凝聚力量的目的。

(四) 组织社会影响效果不明显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社会影响是社会民众对民主党派认可或政治支持程度的重要反映,是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价值功能实现的关键衡量指标。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组织基础,基层组织是民主党派联系社会的重要纽带,也是社会了解和认识民主党派的重要窗口。增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社会影响是民主党派更好地履行参政党职能、发挥民主党派积极作用的重要保障。

调研表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对自身政治属性的理解不深,社会责任认识不到位,联系社会、服务社会工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组织成员对弘扬正能量、展示先进性还需要不断增强。

基层组织参政党意识缺乏。参政党意识是参政党的灵魂,是参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存在的价值根基。很多基层组织对参政党政治属性的理解不充分,将自身混同于一般社会组织甚至是联谊组织,对自己的政治角色和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缺乏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致使基层组织活动基本停留在学习交流、参观联谊、健身娱乐、社会实践等层面。一些基层组织成员缺乏民主党派

认同,日常工作中把自己等同于普通群众,只顾局部利益,缺乏全局观念,只注重个体利益,不关心社会事务,也不参加党派活动,严重影响了参政党的社会形象。

基层组织参政党作用弱化。很多基层组织对参政党职能存在简单化理解,将民主党派基本职能等同于基层组织的基本职能,片面强调自身的参政议政权利,致使自身组织作用虚化和边缘化。很多基层组织不主动加强与中共基层组织的沟通联系,不积极围绕所在地区和单位的中心工作献计出力,也不能够就身边群众反映和关心的实际问题进行深入调研,而是追求大而无当的所谓社会热点参政议政。这种舍近求远的做法,既不能发挥自身立足基层、熟悉行业的专长,又难以取得实实在在的参政作用。调查发现,有的基层组织为提高参政议政作用,选择参政议政能力较强的成员专门组建参政议政小组,表面上提升了参政议政效果,但实际是使其他组织成员基本处于观望和隐身状态,不利于基层组织整体功能的发挥。

基层组织参政党形象模糊。开展社会服务是民主党派履行职能、扩大社会影响的重要载体。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根据自身情况量力而行做好社会服务工作既是展示成员形象、增强组织认同的重要形式,也是扩大民主党派社会联系,树立自身良好形象的重要举措。但从调研情况来看,很多基层组织社会服务工作的形式、内容缺少民主党派属性,服务定位依靠自身资源无法具备长期开展的物质条件,最终只能沦为“形象工程”,既不利于参政党形象的社会展示,也加重了成员的负担,影响了党派成员持续参与社会服务工作的积极性,难以树立务实进取、为民参政的基层组织良好形象,甚至有的基层组织将社会服务变成自我服务,热衷于成员互助,严重背离了民主党派开展社会服务的原则,也让民主党派形象在公众中的影响大打折扣。

三、基层组织建设突出问题的成因分析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组织基础,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运作的现实基础。长期以来,由于民主党派组织发展和制度运行的一些理论和实践偏差,基层组织在实际运行中面临着各种困难,导致基层组织建设成为难以突破的瓶颈,影响着多党合作事业的运作状态和发展前景。

(一)参政党性质定位的理解误区

基层组织建设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政党性质把握不准确。我国各民主党派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阶级联盟性质的政党。民主党派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影响帮助下,在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过程中,走过了一条自身发展的独特历史道路。这种独特发展道路使得民主党派“不能用英、美政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10]。但是,在英、美政党标准话语强势支配的背景下,准确把握民主党派的政党性质成为基层组织的实践难题,由此产生人们对民主党派性质的各种认识误区,进而影响对民主党派是政党的本质判断。这种本质属性的分歧必然影响基层组织在实践中的行为选择,乃至出现很多不符合参政党政治角色的行为,成为民主党派组织建设尤其是基层组织建设问题的内在根源。

同时,我国民主党派的组织体系建设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渗透式发展模式。这种组织发展模式客观上形成了注重中央组织作用而忽视基层组织建设的先天不足。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传统实践的薄弱和历史经验的贫乏造成了新时代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可资利用和参照摹本的资源短缺,也加剧了基层组织建设的实践难度。随着新时代基层组织建设重要性的提升,各地基层组织也在进行着不同程度的实践探索,这种探索过程带有自发性和试错性的尝试特征。面对自身历史方位和使命任务的重大变化,其中难免夹杂着一些与时代实践不相适应的问题。

（二）基层组织目标任务的实践张力

我国各民主党派章程都对基层组织基本任务有着明确规定。从规定的具体内容来看，各党派基层组织任务大体相似，主要包括：贯彻执行上级组织的决议和决定，组织党员参加本党组织的各项活动；发扬自我教育传统，不断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围绕所在地区和单位的中心任务，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关心党员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反映党员的意见和要求；组织党员开展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讨论对党员的奖励和处分；发展党员，收缴党费等^[1]。根据章程对基层组织基本任务的规定，各民主党派在推进基层组织建设中提出了组织建设的相应目标。例如，民革提出建设“思想政治素质高、组织工作规范、履职能力强、规章制度健全”的充满活力、特色鲜明、具有示范引领带动作用的示范支部。民建提出把基层组织建设成为自我教育的学校、团结互助的集体、参政议政的桥梁、培养人才的基础。

但在实践中，基层组织任务目标的落地却与基层组织内在属性存在天然的张力。通常来说，基层组织目标任务的实现有赖于基层组织的主动谋划与积极作为，但由于基层组织并不具有直接进行参政议政、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履职行为的职能，也没有直接面对发挥政治功能的压力，因而容易产生内生动力不足的现象。从实际运行来看，基层组织作为上级组织任务的接受者和执行者，只是为上级组织履行职能提供服务和支撑，同时基层组织普遍缺乏执行组织任务的资源优势，这就造成基层组织在面对上级组织任务目标的实践中理性选择最有利的应对行为。被动应付或变通形式成为最常见的执行方式，并以此来规避可能带来的组织风险和减少组织成本。同时，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设置比较宽泛，基本上不依托基层政权单位建立，而是一个基层组织横跨多个单位或者行业，由于组织设置与本职工作的关联性低，组织对成员也难以形成有效的

激励和约束。这种情况下，中共党组织和工作单位难以为基层组织建设目标实施提供相应的支持，也使得基层组织建设目标任务的落实缺乏有效的保障机制，在民主党派内部组织制约有限的情况下，基层组织建设目标任务实现的主动性和实效性自然会降低。

（三）领导班子责任担当的激发难题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领导班子的责任担当对于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关系重大。一个基层组织建设质量的高低，领导班子特别是带头人起着决定性作用。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可以带来组织化的内部凝聚和发展空间。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过程中，领导班子不仅是基层组织工作的组织者和推动者，更是组织成员的引领者和示范者。因此，基层组织领导班子带头人不仅需要思想政治素质高、热爱和熟悉党派工作，而且需要具备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群众基础，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有强烈的责任担当和奉献精神。

然而，基层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基本上都是兼职党派工作，甚至有的基层组织主委身兼多职，多重身份属性淡化了党派基层组织的责任主体，很大程度上稀释了基层组织领导的主体责任。同时，随着基层组织领导班子的年轻化，年轻一代民主党派成员缺乏对多党合作光荣传统和奋斗经历的切身感受，缺乏对新时代民主党派使命职责的深刻认识，进而造成责任担当的内生动力不足、担当意识不强，容易出现敷衍塞责、不想担当的现象。此外，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设置是一个相对偏重任务而职权赋予有限的独特存在，资源配置的不对等影响着基层领导班子的职责赋能。在缺乏权利和资源支持有限的情况下，不同于中共基层组织严格的纪律约束，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并不存在严格的内部监督，很多领导班子成员出于功利考量很难展现出强烈的责任意识 and 担当精神。

（四）成员主体性自觉的参与倦怠

党派成员是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核心资源和

工作焦点，在以团结引导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更好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心聚力的民主党派使命践行过程中，发挥成员积极作用，广泛调动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基层组织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组织成员的主动融入和积极参与是基层组织建设开展的先决条件，而组织对成员的吸引和支持则成为衡量组织建设质量的重要依据。

要让更多的党派成员自觉投身基层组织建设、投身多党合作事业，关键是要把成员的主体性自觉和积极性调动起来。成员主体性自觉既需要充分体现组织政治功能的目标以满足成员的心理预期，又需要有持续的活动过程来接近实现目标的行为。但受体制机制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当前基层组织在组织目标和行为衔接上都不充分。一方面，尽管基层组织在民主党派自身建设方面具有重要基础性作用，但与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形象相比还距离较远，尤其基层组织并不直接行使参政党职能，对国家中心工作和大政方针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与有志于参政为民的知识分子成员的期望形成反差，容易对自身的身份角色产生挫折感，自我满足感和成就感下降，参与热情自然降低。另一方面，基层组织的组织生活和日常活动缺乏鲜活内容，单调枯燥，尤其在一些硬性考核指标的要求下，为了规避责任风险更容易出现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行为，对于本职工作已经繁重的党派成员来说，还需牺牲休息时间来应付碎片化的组织生活活动，会在内心中产生反感和抵触。长此以往的组织活动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成员的情绪低落、积极性下降，进而会导致他们缺乏对组织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四、加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的实践进路

面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共同责任。加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

建设，打牢民主党派发挥积极作用的组织基础，需要正视问题、解决问题，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好地凝心聚力。

（一）增强基层组织的政治功能

提高政治站位。政治站位是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所应具备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要求，是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政治属性的显著标志。基层组织只有提高政治站位，才能站稳政治立场，才能增强大局观念、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才能把牢基层组织的政治方向，体现出基层组织的价值本位和政治共识。提高政治站位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中共中央对多党合作事业的新部署新要求，切实提高研究谋划工作的政治站位、理论站位、时代站位，自觉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

明确政治责任。政治责任是民主党派作为国家治理重要主体的职责和使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目标，促成双方在长期共同合作中塑造了新型政党关系。这种多党合作的制度安排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不同政治角色和职能。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不仅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基本权利，更是民主党派对于国家和人民必须履行的政治责任。基层组织明确政治责任不只是作为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的宣示，更应化作日常的组织行动，始终保持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始终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立足基层，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共识凝聚、关系协调、民意反映和社会稳定等工作，展现参政党的政治责任和政治功能。

（二）健全基层组织的制度体系

树立规则意识。规则意识对于维持组织生活尤为重要。制度是组织的建立基础，通过制度规则创设一种情境，在这个情境中，人们知道自己的身份和组织特点以及个人在组织中的角色职责。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中，规则意识并不理想，多党合作的制度原则并未得到有效贯彻，民主党派的组织职责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基层组织生活制度并未得到严格遵守。组织规则意识的缺乏，造成了基层组织的软弱涣散、民主党派成员的身份意识淡化、基层组织作用的日益衰减。推动基层组织规则意识的确立，加强基层组织的制度化建设水平，不仅有利于民主党派良好社会形象的展示，还有利于民主党派成员通过组织增进身份认同和实现个人价值。

注重制度体系的系统性原则。完善的制度体系需要各种制度和机制的相互联系、相互衔接、相互配套，以达成制度的严丝合缝，实现制度体系的整体功效。基层组织制度体系的完善既需要从宏观上呼应民主党派制度建设的原则要求，更需要体现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履职能力建设、作风建设的完整建设内容，将制度建设贯穿组织生活的全过程，由此促进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制度体系的上下衔接、左右联动和整体配套。

完善适合基层组织特点的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促进基层组织规范化发展。基层组织制度体系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组织建设的随意和无序，使一些成员在组织归属和行为选择上茫然冷漠、消极作为。在这种组织环境中，成员共同认可的价值和实践容易扭曲或消解，难以形成团结向上、务实进取的组织氛围，不利于调动成员的积极性。健全基层组织制度体系，提升工作的制度化水平要形成符合组织建设需要、适合基层组织特点并且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当前尤其要完善基层组织工作制度，建立理论学习制度、主题活动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组织奖惩制度，以及与中共基层党组织、统战部门的联系制度，

就工作中问题及时商讨、有效沟通，使基层组织融入地区和单位的中心工作，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保障作出贡献。

（三）创新基层组织的工作方式

突出民主集中制工作原则。民主集中制是我国民主党派组织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规范组织生活、开展组织活动、搞好组织建设的基本遵循。民主集中制既是对执政党组织建设经验的学习和借鉴，更是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实践发展和工作要求的经验累积。民主集中制原则内含着组织关系，强调在民主基础上形成组织的集中意志和集体行动。它使每个成员都能在由集体意志建构起来的组织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价值依托和行动目标，建构起牢不可破的集体联系。在这种联系中，组织成员的意见、利益和要求可以实现广泛参与、充分表达和真实体现，使组织真正成为团结凝聚广大成员智慧和力量的阵地。

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创新工作方式。在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功能和责任日益凸显的形势下，工作方式的失灵引发了民主党派作用发挥的不足，组织聚合的难度造成了民主党派整体功能的低效。创新是基层组织担负时代职责的动力源泉，是基层组织更富时代气息的制胜法宝。创新基层组织工作方式要在政治原则一致的基础上加强思想引导，改进学习方式，充分发挥协商民主和自我教育的传统，引导成员形成思想活跃、意见多元的状态，从而增进政治共识；要在组织目标一致的基础上提升业务融合，充分利用成员职业特点和专业优势化解本职工作与党派要求的张力，形成业务与党派工作的相互促进；要在制度规范一致的基础上注重实际成效，重视情感沟通，充分运用成员日常管理与激励示范的双重效应，实现成员间团结合作和共同进步，提升组织的凝聚能力。

（四）激发基层组织的组织活力

发挥成员主体作用。成员是基层组织的主体，充分发挥成员的能动性是保持组织活力的关键所在。在基层组织生活中，成员主体作用要求的是

一种组织关系，强调组织对成员的团结和凝聚作用，而不仅仅注重因身份联系起来的孤立个体的作用。这种通过组织形成的集体身份，既需要成员对组织的责任与担当，又需要组织对成员的尊重与支持。在集体身份认同的基础上充分展示成员个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实现党派成员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把成员主体作用的发挥与党派基层工作、基层组织建设的具体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使成员主体作用在基层组织活动中得到充分尊重和落实。

严肃组织生活。基层组织生活是民主党派教育管理成员和成员提高政治素质的主要平台，也是锻造和激活成员主体作用的重要形式。严肃认真的组织生活是营造团结和谐组织氛围的基础，是确立成员主体意识的条件。组织生活既是对党派成员思想行为的规范和约束，更是对其参与组织生活热情和创造性的激励和保障。只有严肃基层组织生活，丰富基层组织生活内容，净化基层组织生态，纠正组织生活的形式化、庸俗化，避免基层组织的官僚化、行政化，增强基层组织生活对成员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能增强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激发成员的主体地位和参与组织生活的行为自觉，调动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拓宽发挥作用的渠道。发挥成员作用是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目的，也是基层组织建设质量的评价依据。便捷畅通的作用渠道不仅是体现成员党派权利的重要内容，能够展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优势，还能促进集智聚力的实现，为民主党派积极作用的发挥创造有利条件。破解民主党派作用发挥不足的难题，就要充分发挥制度渠道的效益，把党派组织的优势利用起来，把党派成员的智慧 and 力量聚集起来，使其始终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要建立同中共党组织的有效联系渠道，保证党派基层组织工作的政治方向，加强党派组织系统内的密切联系，形成基层组织与地方组织乃至中央组织的通

达渠道，积极关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融入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促进基层组织与社会的有效联系，建构基层组织联系群众的有效纽带。

五、结语

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是在多党合作历史进程中发展和演变的，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不同的多党合作主题，也有不同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要求。尽管如此，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价值和功能是始终存在的。因此，也就需要民主党派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建设目标与方法。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问题正是在此基础上被发现并不断寻求解决的。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是在借鉴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建设经验和参政党自身组织属性基础上创造的新的政党组织建设实践形式，具有不同于其他政党基层组织建设的新特点。它从一开始就注重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基础和突出本党派的组织特色，并以此构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价值立场和实践基础。不论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还是保持党派的特色优势，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具体运作形式，都是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作用的根本保证。

作为民主党派组织体系的基本单元，基层组织始终将政治原则和组织特色当成组织建设的根本标识，看成承载组织发展和承担组织任务的重要依托。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应以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为前提，以政治交接为主线，以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为重点，坚持组织存在的政治责任，从党派的组织优势进行基层组织的建设和活动，团结和引导组织成员和所联系群众投身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宏图伟业，从中获得政治感悟，巩固政治共识，提升政治能力。强调基层组织建设的政治原则和政治立场，避免基层组织建设的价值迷失和方向偏离，是我国民主党派组织建设一以贯之的根本要求。

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加强民主党

派基层组织建设为中国共产党协调和整合社会各方面关系增加了更宽广渠道,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凝聚各方面奋斗力量提供了更便利路径。最大限度凝聚共同奋斗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根本保证,也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最大优势。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具有广泛联系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政治优势。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是民主党派联系和团结人民的最前沿阵地,是保持民主党派政党特色的最原初源头,坚定政治立场,明确奋斗目标,增强组织优势,扩大组织影响,形成健全的、规范的组织形态,可以为新时代展示参政党新面貌奠定坚实基础,有利于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起强大的社会合力,全面提升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效能。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276.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 497.

- [3] 布莱克. 比较现代化[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43.
- [4] 习近平.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增加历史自信增进团结统一增强斗争精神[EB/OL]. (2021-12-29). <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1/12-29/9639907.shtml>.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289-290.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EB/OL]. (2021-06-25). <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707415/1707415.htm>.
- [7]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EB/OL]. (2021-02-02). <http://cpc.people.com.cn/n1/2021/0202/c117005-32019557.html>.
- [8] 休谟. 人性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509.
- [9] 习近平出席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 (2021-09-28). http://www.gov.cn/xinwen/2021-09/28/content_5639868.htm.
- [10]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171.
- [11] 中共中央统战部一局. 各民主党派全国代表大会文件选编[G].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8: 56.

责任编辑: 吉强

试论民主党派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

华正学 冯文恺

摘要：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是民主党派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为确保成员发展质量而建构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推动民主党派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政治创造。以民建为例，自其创始之初建立第一批章程起，这项制度就一直存在，并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有效地发挥了政治担保、思想引领、组织培养和品行检验的功能作用，为建设高素质有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作出了有益探索和积极贡献。

关键词：民主党派；介绍人制度

中图分类号：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1-00049-06

中国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主体。各民主党派自创建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以来，就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质量。在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的探索实践中，有一项制度规定自各党派创建之时就存在，历经新型政党制度70多年的发展演进，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项制度就是各民主党派关于入党（会、社）介绍人的有关规定。

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是各民主党派为确保自身发展质量而建构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政治创造。这一制度在中国各民主党派参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有效地

发挥了政治担保、思想引领、组织培养和品行检验的功能和作用，为确保各民主党派建设成为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素质参政党做出了有益探索和积极贡献。

一、一项确保民主党派发展质量的重要政治创造

政党“是由特定阶级的骨干分子在共同政治纲领的指引下，为谋取和巩固政权而在政治活动中采取共同行动的政治组织”^[1]。相较于一般的政治组织，民主党派具有阶级性与广泛性相统一的鲜明特点，也是由特定的阶级或阶层骨干分子所组成，具有特定的组织和严密的纪律的政党。民主党派也必须加强自身建设。为此，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就成为确保党派发展质量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其应运而生也就有着深刻的理论

收稿日期：2022-01-09

作者简介：华正学，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冯文恺，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20年度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反贫困思想百年发展史研究”（20&ZD0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逻辑、深切的实践逻辑和深邃的历史逻辑。

（一）理论逻辑：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

民主党派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参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跟上中国共产党和时代发展的脚步，民主党派必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只有将自身质量建设放在第一位，通过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制度和措施加强党派的进步性和广泛性建设，民主党派才能彰显其价值、发挥其作用，才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确立其应有的位置。

当然，在加强自身建设发展过程中，民主党派可以选择的手段、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严把入党（会、社）成员的质量关，切实从源头上把好成员接收的第一道关，防止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不合格成员混入党（会、社）的队伍，不失为加强党派自身建设的重要的务实举措。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在党派自身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吸收发展新成员的时候，明确要求有成员介绍推荐，就成为确保成员发展质量的一个较好制度安排。由于介绍人对介绍对象非常熟悉了解，最能在内心深处对照章程要求衡量比较介绍对象是否达到入党（会、社）标准。因此，经过介绍人认可推荐的同志一旦被接受为新成员，入党（会、社）的新成员一定是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真正忠于工人国家的人，正直的劳动者”^[2]，是在社会公众中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这样，就从根本上确保了党派成员的发展质量，为民主党派进步性和广泛性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二）实践逻辑：革命、建设和改革条件下确保成员发展质量的特定安排

中国各民主党派诞生于中华民族争取独立与解放的“革命年代”，成长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建设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环境的发展和

时代任务的变化，必然对民主党派的建设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要求，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也就是说，民主党派只有成功地应对并顺利地解决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环境下遇到的时代课题，其自身建设才能不断巩固和推进。

在革命战争年代，民主党派同样面临着极其复杂险恶的生存环境。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使民主党派也时刻处在被解散、被围剿的危险境地。为了保证自身的战斗力和独立性，党派必须非常注意自己队伍的可靠性问题。不仅要保证发展吸收的每一名新成员政治合格、思想合拍；同时，更要防止反动分子借此打入党派内部，破坏民主党派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事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方面，民主党派加强自身政治建设的任务繁重，要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政党转变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对党派成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参与国家建设的要求更具体了，民主党派不但要政治进步，更要具备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本领。进入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新时代以后，民主党派肩负的使命更重、责任更大，同样面临着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为了更好地参与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贡献，民主党派必须强化自身建设，不断加强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真正把各民主党派建设成为积极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参政党。在此基础上，民主党派比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种条件下都更加重视成员的质量建设。强化党派成员的进步性建设，确保新发展成员的质量，就成为新时期、新时代加强民主党派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三）历史逻辑：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成功经验的大胆借鉴

回顾世界政党政治的历史，不难发现，入党介绍人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重要的建党原则，是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独创。

自1847年12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一次明确出现介绍人制度相关规定^[3]，到后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苏联共产党和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普遍沿用并发展这一制度，入党介绍人制度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道靓丽的政治风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产阶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承继过来，自1921年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通过的党章，始终都有入党介绍人制度的相关规定，较好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经验的中国化，成为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政党执行入党介绍人制度的典范、样板。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曾经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共同为争取民主而奋斗。从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起，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全面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从此开始确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参与多党合作制度的实践中，民主党派从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先进性建设的诸多好做法、好经验中吸取教益，用以党派建设、发展。其中，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就是各民主党派从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先进性建设的成功实践中获得的最大收益和最可行做法。各民主党派通过引进、借鉴中国共产党的好做法、好经验，普遍建立起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从而使民主党派队伍建设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健康轨道。

二、民主党派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功能的历史演进

介绍人是党派与入党（会、社）积极分子之间的组织联系人、思想考核人、行为见证人和入党（会、社）推荐人。积极分子能否入党（会、社），介绍人的意见建议至关重要。因此，介绍人制度的最大功用就是确保成员发展质量，提升民主党派的建设水平。所以，关注民主党派入党（会、社）

介绍人制度，最重要的研究范式还是介绍人功能作用发挥的视角和维度。依据不同时期介绍人制度功能作用发挥的不同特点，我们将民主党派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的嬗变演进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1948—1956年，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介绍人制度主要发挥“政治担保”功能作用

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和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要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另一方面，又要不失时机地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在此期间，民主党派的根本任务，就是从一个联系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争取民主的政党，转变为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与时俱进地跟上时代发展和社会制度根本性质的变化。

在这样的形势、任务、困难和挑战面前，要成为民主党派的一员，不但要证明自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反对革命，更要表明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面前积极投身革命，是为了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建设，为国家和人民多作一些贡献，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主动加入民主党的。这时，在吸纳和发展新成员的过程中，制度性地配备2名成员做介绍人，要求介绍人必须全面了解被介绍人的基本情况，尤其是加入民主党的动机、思想状况和政治态度，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认同程度，代表党派组织对拟发展的成员把脉、把关。这样，一方面确保了成员发展质量，保证了民主党派队伍的纯洁；另一方面对介绍人也是一个严格的约束、无声的考核。因此，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就成为一项非常严肃的政治制度，成为具有新发展成员政治担保功能的一种制度。

应该说，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

民主党派入党（会、社）介绍人主要承担政治担保职责并发挥作用，这主要还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民主党派建设的总体任务决定的。面临社会性质的根本转变，面对民主党派性质的根本转变，党派成员的政治态度是第一位的。只有政治上靠得住、思想上要进步，才有可能加入民主党派；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民主党派才能存在、发展。所以，这一时期，民主党派入党（会、社）介绍人更多地政治上把关，切实把那些政治上靠得住同时又愿意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积极奉献的人引荐到民主党派。

（二）1956—1978 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介绍人制度主要发挥“思想引领”功能作用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确立，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将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这一时期党和人民的中心任务和主要奋斗目标。适应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各民主党派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团结和教育各自成员和所联系的对象，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社会主义政党。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展现。民主党派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团结教育自己所联系的那一部分社会成员，深刻认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心，在转变思想观念的基础上，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因此，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的迫切性更强烈了，要求也更高了。在实践教育和亲身感受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人员表现出强烈的加入民主党派的热情，希望通过加入民主党派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此，民主党派必须慎之又慎，要通过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切实让那些想要加入和即将被批准加入民主党派的成员真正转变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加入党派

的自觉性。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派对自身的组织发展和新成员接纳必须慎之又慎，要坚决地阻止投机分子加入党派，要把那些“不是来革命，不是来为人民服务”，而是想利用民主党派的地位和影响来升官发财、获取社会声望的人坚决地拒之于党派之外。只有那些政治合格、思想过硬的优秀分子和代表性人物，才可以引荐和吸收到各民主党派中来，成为推动民主党派发展进步的积极力量。所以，这一时期，民主党派的入党（会、社）介绍人要把思想政治标准放在首位，耐心细致地做工作，与被介绍人多联系、多沟通，深入了解把握被介绍人的思想活动状况，向被介绍人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民主党派的基本知识，不断提高积极分子的思想认识，端正他们加入民主党派的动机，成为入党（会、社）积极分子思想进步的引路人。只有那些形成了正确的思想认识、达到了组织发展条件的同志，才能够在介绍人的推荐介绍下加入各民主党派。

（三）1978—2012 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介绍人制度主要发挥“组织培养”功能作用

1978 年 12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新中国从此进入到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党和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不仅中国共产党全面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全面推进，参政党概念被明确提出，民主党派建设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上，民主党派重新焕发生机活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断制度化、规范化，参政党的科学概念正式确立。为了推动新时期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民主党派大力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

地位超脱、作用独特的优势，全面参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结合新时期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的人才培养要求，适应民主党派新老交接、政治交替的现状，在组织发展中，民主党派特别注意将经过改革开放考验的优秀人才吸收到党内来，入党（会、社）介绍人也特别注意在经受考验的青年知识分子和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新社会阶层中做工作，考察那些在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活动中经受住考验的优秀分子，联系那些积极投身改革开放事业、为国家人民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分子，及时将政治合格、思想过硬、工作积极的优秀分子推荐入党、入会、入社。入党（会、社）介绍人积极活跃在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的最前沿，按照新时期民主党派成员的发展标准，为党（会、社）选才，为党（会、社）育人，较好地承担起民主党派组织培养的责任和工作，成为新时期民主党派成员吸纳的“助产士”、队伍建设的“质检员”。

（四）2012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介绍人制度主要发挥“品行检验”功能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相一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科学概念被明确提出，“新型政党制度”的全新命题得到全面阐释，民主党派全面加强自身建设，正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

新时代对民主党派发展提出新要求、新挑战，为此，民主党派入党（会、社）介绍人要认真负责地了解被介绍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对党派的态度，要熟悉被介绍人的个人情况，并如实向党派组织介绍、汇报。要经常找被介绍人谈心，对其进行民主党派知识的教育，帮助被介绍人提高认识、端正加入民主党派的动机。定期向党派组织汇报对被介绍人培养、教育和考察的情况，

切实发挥对要求入党（会、社）同志进行品行检验的功能和作用。

当然，民主党派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的功能作用是全面系统的，上述四个阶段划分中所论及的“主要”功能作用，只是一定时期内民主党派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所发挥的最主要、最突出、最独特的功能作用，远不是介绍人制度功能作用的全部。深刻洞悉和全面把握民主党派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演进的特点和规律，要求我们将局部与整体、重点论和两点论有机统一起来，在“主要”功能与“整体”作用的相互协调中认识并探究民主党派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的嬗变演进。

三、民主党派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实践的经验启示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建70多年来，民主党派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作为经过实践检验的加强党派自身建设的重要制度安排，留给我们的经验是丰富的、启迪是深刻的。在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全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形势下，我们尤其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吸收借鉴民主党派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实践的经验启示。

（一）夯实理论根基，毫不动摇地把成员发展质量放在党派建设首位

民主党派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的重要性主要是由党派成员的重要性和党派成员发展质量的重要性决定的。应该说，只要是一个高度重视党员发展质量和党建工作质量的政党，就没有理由不重视入党介绍人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实践，民主党派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已运行70多年，实践经验丰富。但是，相对于丰富的实践经验，民主党派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的理论建构却相对薄弱，亟待加强。如何在已有70多年成功运行的实践基础上，切实思考事关民主党派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的价值理念、理论依据、主体内容、运行规则和监察惩戒等一系列理论问

题,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也就是说,民主党派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的理论根基还不够厚实,还必须不断地加以完善。我们一定要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业长青的战略高度,建构民主党派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的理论体系,真正回答民主党派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是什么、为什么、如何为、为如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系统完备的民主党派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的理论体系,用更加科学严整的入党介绍人制度去护佑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伟大实践。

(二)强化实践操作,让刚性的民主党派入党(会、社)制度切实硬起来

从已有的历史实践看,民主党派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有着严谨的实践操作环节,是一项始终活着的“硬制度”,有效发挥了民主党派自身建设“质检员”和成员发展“助产士”的作用。但是,随着形势和条件的变化,也确有一部分党派组织和领导干部没有像原来那样重视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了,不了解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设置的目的,不熟悉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运行的规则,不认同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发挥的积极作用。在实际的组织建设和党员发展中,入党(会、社)介绍人没有认真地了解发展对象对党的认识、入党动机、政治觉悟、道德品质、工作经历和各方面的表现,以及家庭主要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情况,没有耐心细致地向发展对象解释党派的纲领和章程,说明党派成员的条件、义务和权利,没有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端正加入民主党派的动机。这些使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形同虚设,让曾经最硬气的制度“软”下来,严重危害党派成员的发展质量,给民主党派的建设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因此,我们必须从过去 70 多年的成功实践和惨痛教训中吸取经验,不断强化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的刚性约束,“要把‘认真’作为干部管理工作的一条

重要原则”^[4]。让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真正硬起来、严起来,成为新时代加强民主党派建设、提升成员发展质量的制胜法宝。

(三)提升素质要求,推动新时代民主党派高质量、科学化建设

始终重视党派自身建设和成员发展质量,这是民主党派的光荣传统和成功经验。但是,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70 多年的成功实践看,民主党派在介绍人方面的相关要求和规定还有很大的完善余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70 多年来,在各民主党派的章程中,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的文字表述几乎没有太大变动,这是不应该存在的薄弱环节。必须深刻认识到,时代、形势和任务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各民主党派对自身成员的要求也有了更高标准,民主党派入党(会、社)介绍人制度不可能一成不变,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加以丰富、完善。党派入党(会、社)介绍人更应该由那些德高望重的有丰富经验和强烈责任心同志来担任,不断提升入党(会、社)介绍人的条件、素质和要求。要通过选拔高素质的介绍人,来提高党派成员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为新时代民主党派的建设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不断推动民主党派建设上水平、上台阶。

参考文献:

- [1] 孙关宏,胡雨春,任军锋.政治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240.
- [2] 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3.
- [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39.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350.

责任编辑:鲍跃华

理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三个维度

桑 雷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有根、有源、有生命力。这个“根”与“源”,既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孕育的政治文化,也来自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政治实践。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三个维度,阐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根、源和生命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和合”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国政治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促进科学有效决策、维护社会安定和谐、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制度优势,在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的不同场域体现出鲜活的生命力。

关键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优势;治理效能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1-00055-06

我国学者关注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大致在21世纪初,当前在理论研究中已基本形成共识。不同于西方民主的工具理性,我国学者更多强调的是民主的价值理性,其涵盖了对协商主体和协商过程两个方面的民主要求,旨在追求最大限度的政治一致和人民福祉。具体地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和“协商民主”两个重要政治术语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规定了“协商民主”的性质和本质,“协商民主”体现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进步,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定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有根、有源、有生命力”。这个“根”与“源”,既来自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孕育的政治文化,也来自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政治实践。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维度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一个热爱和平、讲求和谐、善于协商的民族,由此形成了“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也正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思想来源^[1]。

(一)“天下为公、仁者爱人”的民本思想

“协”的本意指的是许多人协力合作,“商”的常用义是相互之间交流观点和看法。中华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精深的内容,包含了丰富

收稿日期:2021-12-24

作者简介:桑雷,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制治互洽的逻辑: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路径研究”(2020SJB094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的民本思想,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相吻合。在我国古代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儒家学说,始终将“仁、义、礼、智、信”作为价值坐标,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思想。这些最朴素、最直接的民本思想,倡导统治者应当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提醒统治者要顺民心、听民意,方能政通人和,这些思想也在长时间内被统治者当作治国理政的重要遵循。在这种民本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古代社会也孕育出了最早关于多层协商的制度文化及其表现形式。例如,秦朝开始实行由氏族会议发展而来的朝议制度,成为君王听政议政的主要形式。通过朝议制度,君王通过朝议或朝会汲取他人的智慧,解决统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之后,由此发展而来的谏官制度和监察制度等,也类似于古代官方的政治协商制度,这些早期的议事制度是当时的政治生活依托和政治文化组成^[2]。经过长期的代际传承,“协商”逐渐成为民众最稳固的意识形态,为推进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根基。这一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民本思想,也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核心和灵魂^[3]。

(二)“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和合思想

我国古代哲学推崇“中庸”思维,体现在政治价值观念上就是和合思想。将“和”视为政治文化的最高境界和治国理政的价值标准,这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倡导的多元利益主体和谐共生的基本精神相契合。早在两千多年的春秋时期,《国语》就有了“和”的表述。在中华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和”文化一直保留和传承下来,和合思想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天人合一”到“人道合一”,体现的是不同事务、不同观点之间的交流互鉴^[4]。在政治和社会实践中,和合思想强调和衷共济,倡导“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兼容并蓄”。也就是说,和合思想强调的是通过对话而非对抗的手段解决问题和矛盾,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均衡和协调。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

人同而不同”,“和而不同”追求的不是消除个体之间的差异,而是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通过积极的协商和沟通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体现的是公共利益的价值观和辩证统一的方法论^[5]。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等理念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我国的政治文化中,为协商民主在我国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背景,形成了协商民主精神根植于中国的重要文化资源^[6]。

由上可见,中国共产党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深厚积淀中汲取智慧和营养,创造出具有政治文化特点、符合政治发展实际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和组织形式。

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维度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经历了协商救国、协商建国、协商治国的发展逻辑,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创造。

(一)协商救国:从理论到实践

1840年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难以为继的大清帝国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中走向深渊,“救亡图存”成为近代先进分子的共同梦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以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将共产主义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光明之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新文化运动提出的“德先生”(民主, Democracy)和“赛先生”(科学, Science)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民主革命思想渐入人心。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随后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进程中,“协商救国”思想不断深化。这一时期的协商实践以政党协商为主。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沉痛打击了北洋军阀;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保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为夺取抗战胜利,调动各个方

面的积极性,在抗日根据地开创了“三三制”民主政权形式,这也可以看作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发展的萌芽。抗战胜利以后,《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的签署,以及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各个党派以和平方式共商国是的组织形式,积累了中国共产党同其他政党政治协商的经验,为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实践基础^[7]。

(二) 协商建国:从策略到制度

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号召”,是中国共产党民主“协商建国”的一次重要尝试,开启了各党派之间民主合作、共商国是的新路径,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积极响应。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以确立,民主协商在制度化建设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并逐渐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中一种制度化的民主形式^[8]。此后,中国共产党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协商座谈会”“双周座谈会”等协商形式,对新中国建立初期“一化三改”的有效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9]。这样,伴随着新中国初期建设实践的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协商民主建设也在不断进行着理论探索和实践积淀,协商制度在内生环境中成长和发展并不断走向成熟,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逐渐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使命:从协商建国走向协商治国。

(三) 协商治国:从规范到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党中央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我国在拨乱反正之后重新恢复了民主政治建设,协商民主重新受到重视并取得新的进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逐渐规范化、体系化。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共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概念。一方面,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更趋完

善(见表1)。另一方面,党的十三大至十九大的报告,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公报均强调了协商民主的地位作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并逐步上升到治国理政的层面,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指导^[10]。

表1 改革开放以来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主要进展

序号	年份	代表性制度(文件)	建设进展
1	198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明确政治协商的地位和作用
2	1989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	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3	199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以法律形式明确政治协商制度 ^[11]
4	2006	《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	明确民主选举和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形式
5	2015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	提出加强协商民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渠道程序和体系建设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协商民主在我国产生、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经历了协商救国、协商建国、协商治国三个阶段的逻辑演进,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理路是基本一致的。换言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在中国的生动实践,在总体上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民主政治成长的生态特征^[12]。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生命力:中国制度优势的理解维度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反映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特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13]其中,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主导地位具有合法性基础。几十年的实践也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准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方向,形成巨大的合力,确保协商民主高效有序开展,从而更好地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14]。

(一) 体现人民当家作主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中,社会主义制度确保了人

民始终居于主体地位^[15]。与西方协商民主相比,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真正实现和保障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其一,从英文表述来看,西方协商民主一般使用“Deliberative Democracy”,强调的是讨论与对话,更加注重的是选举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多采用“Consultative Democracy”,倾向于咨询与审议,人民有更大的发言权,更加突出的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统一^[16]。其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作为弥补选举民主困境的被动反思,西方协商民主虽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下的民主政治体制始终难以遮蔽其形而下的实践不足,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和排他性色彩^[17]。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则是一种主动的民主政治创造,是在统一战线、政治协商等实践中培育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民主政治形态。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到“三三制”政权形式的创立,再到改革开放发展战略的实施,都充分尊重了人民的主体地位,表明了践行协商民主与促进人民当家作主的相辅相成、协同共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18]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多样化的协商渠道,体现出鲜明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切实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二) 促进科学高效决策

在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民主与效率一直都是—对难以调和的矛盾。特别是进入信息社会,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引发出更深刻的思考。“速度政治”学派格列佐斯就提出,信息社会政治发展的速度加剧了民主形式的变革,反复的审议和辩论不再可行,提高政治效率成为优先选择。西方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下,由于政党之间代表利益的不同,始终存在着相互竞争甚至相互敌视的风险。例如,自由主义强调的“私利”与协商民主“公意”的矛盾,严重弱化和消解了协商民主的效率^[19]。于是,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协商民主存在的痼疾:决策之前

的有限民主和决策之中的形式民主同时存在,再加上具有极大不确定的压力集团影响,协商民主的过程和结果都拖沓漫长,无形中影响了决策的节奏和效率。相较而言,我国的政治协商坚持民主集中制,决策前的民主协商和决策中的集中议事,保证了决策上显著的政治优势。其一,有助于促进决策民主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涵盖了从人民政协到基层民主的不同层面和领域,确保了公共政策民主参与的广泛性。同时,党和政府通过民主协商、集思广益,吸收并整合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利用公共理性寻求最大限度满足人民利益的方针和政策^[20]。其二,有助于促进决策科学化。逐步趋于规范化、流程化的决策和监督程序,使决策获得了更好的合法性基础,在决策过程中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存在的缺陷和风险,使得决策更加科学和合理,从而提升了决策的质量和水平。党的百年历史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之所以在一段时期内走了一些弯路,原因之一就是背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协商民主没有得到有效的践行。其三,有助于促进决策高效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坚持求同存异,通过制度化的协商渠道表达诉求,避免了因无序参与导致的相互牵扯和低效内耗,同时降低了决策成本,提升了决策效率^[21]。

(三) 维护社会安定和谐

社会中的人民群众利益具有广泛性、多样性等特点,必然会存在着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利益协调,化解矛盾、凝聚共识、增进团结、促进发展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指向之一。西方民主大多是社会经济多元化的产物,各个政党建立在不同的民族、种族、宗教和阶层利益基础之上,本身代表着不同的价值和利益取向。虽然在竞选时会鼓吹所谓“普世价值”骗取政治共识,但是难以从根本上消除相互之间基于根本矛盾的利益排斥和政见分歧,民意分化的风险长期存在。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国家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不同阶层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这样,社会

主义协商民主就有了最基本的政治基础。其一，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形成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党的历史上，远看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的建设，近看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实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分化的新情况，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通过扩大协商主体、畅通协商渠道、完善协商机制等方式，在协商实践中探索出了民主恳谈会、决策议事会、决策听证会、社区论坛等多种协商民主形式，更好听取了不同群体的呼声，保障了不同阶层的利益^[22]。同时，也得到了各个社会阶层更广范围的支持和拥护，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合力。其二，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共同的政治价值目标，形成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坚持“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围绕人民群众共同关心的问题，本着简便易行、民主集中的要求，在平等理性的协商、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畅通了不同诉求表达、不满情绪释放的通道，从而逐渐建立起利益均衡的长效机制，形成党群之间、干群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很好地避免和化解了各种潜在的矛盾和问题，确保了我国经济社会总体上呈现稳定的发展态势。

（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从本质和功能来看，协商民主之于国家治理，既是组成部分，又是具体表现。协商民主之于国家治理的成效与所属社会的性质有关。一般来讲，西方协商民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逻辑起点是个人主义，具有一定的“外生性”，这也决定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微妙而复杂，对选举民主的重视大于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逻辑起点是国家和集体主义，具有一定的“内生性”，内在地把“人民当家作主”体现到政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上来，与国家治理内里相通、相得益彰。其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本身就是一种科学而有效的治理方式。纵

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我们很容易地发现一种现象：协商民主发展正常的时期，党的事业往往是一切向好；协商民主难以开展的时期，党的事业往往会遭遇困难或挫折。可见，作为一种决策方式和共治形式，协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治理效能的“风向标”，是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通过协商民主，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良性对话和互动，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国家与社会共同走向“善治”，形成一种非常有效的政治制度安排^[23]。其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助于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协商民主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表现形式之一，协商民主的每一步发展，都会激发群众参与公共生活的积极性，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进而会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另外，协商民主在提供给民众公共参与机会和参与空间的同时，必然要求民众不断提升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例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的形式多样的基层协商，对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管理、服务、教育、监督等能力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24]。因而可以认为，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运行逻辑，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内在蕴含的公民直接参与国家治理的政治功能，让人民群众实际参与国家治理的全过程，从而真正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总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在我国有根、有源、有生命力。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得到生动体现，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促进科学有效决策、维护社会安定和谐、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制度优势，在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的不同场域体现出鲜活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 2017: 293-294.
- [2][4] 房广顺.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之源 [J]. 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5): 3-10.
- [3] 王翼.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理论生成 [J]. 理论与现代化, 2016(4): 52-57.
- [5] 郭红军.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显著优势探论 [J]. 理论学刊, 2020(3): 93-100.
- [6][7][8] 李金河. 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4(2): 18-24.
- [9] 李传兵.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逻辑与路径选择——兼析中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差异 [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9(6): 120-129.
- [10][17][19] 欧阳康, 曾异. 国家治理语境中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认识历程、制度优势及其治理效能转换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2): 1-7.
- [11] 王凤. 历史演进、实践张力与世界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论纲——兼论西方民主困境的中国方案 [J]. 理论导刊, 2019(7): 56-61.
- [12] 袁峰. 中国形态协商民主的缘起与内涵 [J]. 理论与改革, 2006(6): 12-14.
- [13]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66.
- [14][21] 王永香, 陆卫明. 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1): 114-122.
- [15] 包心鉴. 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中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J]. 学习与探索, 2017(3): 1-11.
- [16] 张宇, 刘伟忠. 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及其构成要素 [J]. 理论与改革, 2016(2): 57-61.
-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 [G].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64.
- [20][24] 张铤.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多维价值、比较优势与提升路径 [J]. 中州学刊, 2017(4): 1-5.
- [22] 郭红军.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三维审视 [J]. 前线, 2020(3): 31-34.
- [23] 汪家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历程与逻辑探究 [J]. 湖南社会科学, 2019(3): 24-29.

责任编辑: 王天海

从“民族平等”到“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百年演变历程

袁本罡

摘要：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的独特意蕴，如何正确对待多元性与统一性的关系是构建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便重视构建中华民族认同。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把“民族平等”作为自身民族观的核心理念。抗日战争爆发后，凝聚中华民族认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阐述重点。新中国成立后，实施民族差别化发展政策，推动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民族工作的重心。面对十八大以来的新形势新任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最新成果。通过百年来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质的认识愈发深刻，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水平不断提升，最终成为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多元一体；民族观

中图分类号：C9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1-00061-07

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是多元性和一体性的有机统一体，如何把握“多元”与“一体”之间的关系是构建中华民族认同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民族观对塑造中华民族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建党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建党初期，以“民族平等”理论回应中华民族认同构建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尝试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团结各族群众；新中国成立后，发展出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为核心的民族工作体系；在新时代，进一步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在这一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

逐渐把握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独特意蕴，并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中找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正确路径。本文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民族观的演变历程进行了梳理，以更加深入地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构建中华民族认同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一、“多元”还是“一体”：中国共产党构建民族观面临的核心问题

中国在历史上拥有一套以“华夷之辨”为特色的民族认同观，其将是否认同华夏文明作为区分本族与异族的核心标准，即所谓“夏变夷者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1]。这套带有强烈“文

收稿日期：2021-12-22

作者简介：袁本罡，中共杭州市委党校文化学与统战理论教研部讲师。

化本位”的民族观超越了血缘、地域差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各民族间交往与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奠定了基调。然而随着近代列强的入侵以及西方民族国家思想的传入，中华文明的自我认同受到冲击，存在数千年的华夷秩序失去生存空间，凝聚中国各民族的认同迫在眉睫，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观念在此背景下萌发。

梁启超是构建“中华民族”概念的先行者。甲午战争的失败让国人的民族意识得到空前激发，民族认同构建问题开始受到重视。在梁启超看来，效法西方建立民族国家体制，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因此，他将“民族”概念引入中国，并在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一文中正式使用“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国民代称，文中指出，“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2]。“中华民族”概念提出后迅速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探讨，当时对中华民族的内涵主要形成了两种不同见解。一派以梁启超、杨度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华民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3]。另一派则以坚持“排满革命”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为代表，他们直接将中华民族界定为汉族。不过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主张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所有民族之统称的观点渐占上风，曾经秉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孙中山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也开始提倡“五族共和”，强调“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是曰民族之统一”，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中华民族”意识自此开始成形。

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族”观念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及。尤其在五四运动后，主张中华民族是国内各民族混合而成的“多元混合说”在国内得到广泛认可^[4]。然而在回应各民族应如何形成民族认同共识时，又有不少人回到了“汉族说”的立场上，譬如提倡“五族共和”的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还曾声称“四万万中国可以说完全是汉人”^[5]。就本质而言，这种立场上的矛盾源于西方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间的错位。西方民族主义强调作为文化认同单位的民族应该

在内部保持高度的统一性，但孕育自“华夷之辨”体系下的中华民族却兼具了“多元”与“一体”两种不同特性。在民族-国家体系面前，中华民族内部原本互为前提的多元性与一体性转而不相容，这也催生出如“中华民族就是汉族”或“中华民族是各民族被汉族同化而来”等论调，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尚未真正把握住中华民族“一体”与“多元”之间的关系，构建中华民族认同仍然任重道远。

二、民族平等：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萌芽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构建中华民族认同问题，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提出了一套以“民族平等”为内核的民族认同理论。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民族整体视为世界无产阶级联盟中的一分子，进而为民族解放事业谋求合法性。李大钊就曾指出，中华民族“是被全世界资本主义压迫者之一，所以我们的民族自由运动，不是单纯的一个民族运动，而是和全世界被压迫的阶级及被压迫的民族自由运动互相联结的”^[6]。另一方面，“民族平等”理论还被用于阐释各民族间关系。1922年，中共二大宣言首次提出将“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作为党的奋斗目标。除此之外，宣言还特别指出中国将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7]。宣言还称，汉族占据人口绝对多数的“中华本部”应该“统一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而“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则“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8]。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提出的“民族平等”理论具有两大创新。首先，其开创性地将中华民族认同构建置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洪流中看待，进而阐明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即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诸民族中的平等一员。这一定位既奠定了构建现代中华民族认同的合法性，也为民族解放事业指明了根本方向。另一方面，该理论高度重视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问题，并指出构建中华民族认同的前提是要

实现内部各民族的完全平等。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中共二大提出了以“联邦制”模式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的设想。

这套理论敏锐地把握住中华民族认同构建进程中必须完成的两大任务,即通过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一体”凝聚和通过践行民族平等理念实现各民族的“多元”团结。更重要的是,中共还指出这两大任务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因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需要中华各民族团结一致,而实现民族团结的首要前提就是保障各民族间的真正平等。因此,中华民族唯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消除民族间压迫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团结,进而获得民族独立与解放。中共在建党之初提出的“民族平等”理论对中华民族“一体”与“多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独到阐释,其虽在实践上有待进一步锤炼,但却为中共民族观奠定了基调,并在之后的发展中得到了延续与贯彻。

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团结一致、共御外侮迅速成为中国人民的共识,“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空前觉醒。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各民族间内在联系的认识更加深入,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团结各族人民,党的民族观自此发展到系统化、理论化阶段。

全面抗战的爆发让国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大力推进“国族构建”成为当时社会各界以及各党派各团体的共识^[9]。在学术界,顾颉刚就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口号,强调“在中国的版图里只有一个中华民族”^[10]。此观点一经提出,便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反映出国民对凝聚中华民族认同的迫切需求^[11]。在这一背景下,当时国民政府也尝试以“宗族说”对中华民族认同构建问题进行回应。“宗族说”主张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合而成的“大家族”,汉、满、蒙、回、藏等所有民族只是中华民族之下的一个分支而已。因此,中华民族的整体

性具有天然合法性^[12]。

对于以上种种论调,中国共产党以一分为二的态度进行了评判。一方面,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明确指出“宗族说”否认了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本事实,本质上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13]。另一方面,中共也充分肯定了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并不断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障各民族平等自治权力。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代表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重要报告。在报告中,他将中华各族界定为是由“汉族”和“蒙、回、藏、苗、瑶、夷、番”等各少数民族组成的统一体,并指出,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团结中华各族,一致对日”^[14]。在团结各民族的具体路径上,《论新阶段》提出了四个方面重要举措:其一,应保证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并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赋予少数民族以一定的自治权利;其二,在民族地区要设立由少数民族同胞构成的专门委员会,作为处理民族事务、协调民族关系的专门部门;其三,政府要尊重少数民族在文化、信仰、风俗习惯上的差异性,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其发展;其四,要坚决纠正大汉族主义,应积极营造各种民族交往融合的机会^[15]。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又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华民族之内涵作出更详细的阐述,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各族人民“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16]。

在全民抗日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构建中华民族的阐述也聚焦在中华民族一体性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凝聚各民族认同的旗帜。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对中华民族一体性的强调并没有落入“大汉族主义”或“同化论”的窠臼,在坚持民族平等理念的同时,还提出了实施民族自治、尊重少数民族文化风俗、纠正大汉族主义等维系民族平等关系的措施和手段。这是因为通过在长征以及根据地建设过程中的民族工作,中

共已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多元”与“一体”是一对无法割裂的特质^[17]。因此，在强调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同时不仅没有否定民族差异，还主张通过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赋权来强化民族向心力，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凝聚。相较于中华民族“宗族说”，这种基于民族平等理念的认同构建路径真正把握住了中华民族的本质特征，在团结各族人民一致抗日上发挥出更强的号召力。至此，中国共产党民族观开始迈向成熟，成为引领全体党员与人民群众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精神标杆。

四、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实践探索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观实现了理论层面的发展与成熟，但由于客观环境限制，其大部分主张只停留于理论阐述和宣传层面。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压迫剥削制度被消灭，党的中华民族认同构建方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最终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为原则的民族工作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上的着力点主要在推动立法保障、开展民族识别工作、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四个方面。第一，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废除了与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相关的法规政策，将“民族平等”写入宪法及各类纲领中。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各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18]。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诞生，其总纲明确指出，“我国各民族已经团结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民族团结”“民族平等”进入国家根本大法标志着新中国在法律层面上明确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属性以及各民族间的平等关系。第二，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立即着手实施民族识别工作，至1979年，已对包括汉族在内的56个民族

进行了识别。民族识别工作的实施让中华民族在内涵上出现了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和作为内部成员的“56个民族”这一双重结构，这种识别成为落实民族优惠政策的基础，对保护民族差异化起到了关键作用。第三，全面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2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明确了实施民族自治的基本原则。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将民族区域自治确立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此后，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设置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至今已形成包括5个省级自治区、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120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旗）等民族区域自治体系。第四，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还不遗余力地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和国家调配全国力量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质的飞跃。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更是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决战脱贫攻坚等国家战略，建立对口支援机制，向民族地区大量“输血”，缩减东西部发展差距，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

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民族观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基本原则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民族观发展的重心落在了少数民族发展问题上。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对口支援等一系列政策与保障措施，民族差别化发展策略取得了巨大成效，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得到长足发展，大量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得到彻底解决，各族人民对于党和国家的认同感逐渐增强，中华民族认同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日益牢固。但同时应认识到的是，坚持民族差别化发展策略导致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华民族认同构建，在“多元性”上做得比较充分，在“一体性”上的工作相对不足^[19]。这种反差客观上在“汉族”与“少数民族”间制造了区隔，导致一套新的民族“二元结构”出现^[20]。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传统社会结构消解速度加快，对民族差异的过度强调则会影响各民族间的交往

交流交融,对中华民族整体意识产生消极影响。费孝通在1988年提出了“多元一体”理论,其用意也未尝不是提醒国人增强中华民族整体性认同的重要性^[21]。如何在现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推动自身民族观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

五、中华民族共同体: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升华

面对中华民族认同构建中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的民族工作新思想。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述,他指出,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牢固树立国家意识、公民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被写入党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民族观在新时代迎来了又一次升华。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由56个民族共同构成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则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内涵^[22]。第一,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是基本前提。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正式在政治上获得了国家形态,从而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塑造。因此,国家认同事实上也正是中华民族认同在政治层面上的投射,培育国家认同是塑造中华民族认同的前提与基础。第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是最终归属。习近平总书记曾将中华民族形象地比喻为一个大家庭,作为“家庭成员”的56个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风俗,并形成了对本民族的心理认同。但所有民族归根结底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团结才是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对本民族的“小认同”最终都将成为对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三,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精神纽带。“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支撑

5000多年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的,是根植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23]中华文明五千年文化积累塑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独特意蕴,若是没有中华文化土壤的深厚滋养,中华民族认同的构建会因失去精神纽带而彻底沦为空谈。第四,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是政治保障。中华民族在近现代之所以得以复兴,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引领与实践领导。中国共产党既是引领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也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领路人。坚持党的领导地位是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保障,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前提。第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是动力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结合我国实际摸索出的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特色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凸显的人民当家作主、经济共同富裕、文化共同繁荣、社会生活和生态文明共治共享都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物质和精神根基。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全面深化和发展,其突破性主要体现在“一体性”和“全面性”两方面。所谓“一体性”,即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在内涵上更加凸显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本质,更加深刻地阐述了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并强调既要尊重各民族间差异,也要认识到“一体性”要比“多元性”处于更高层次之上。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就指出,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24]。所谓“全面性”,是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意味着中华民族认同构建并非局限在“少数民族工作”上,而是与中华民族所有成员息息相关的重要任务。“五个认同”的提出更是表明构建中华民族认同不能局限在某个特定领域,而应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各方面发力。从这一层面来看,铸牢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党领导下全民共同参与的伟大事业,这也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认同基础。

六、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变”与“不变”

作为一个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构建中华民族认同。正确理解、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独特意蕴成为其构建中华民族认同的主线。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观既有伴随时代发展不断演变的一面，也有始终坚持基本立场不变的一面。通过这种“变”与“不变”，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不断深入，最终成为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

所谓“变”，是指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特质的认识不断深入，最终推动自身民族观不断发展成熟的演变过程。在成立初期，中共敏锐地意识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独特意蕴，并树立起以“民族平等”为标志的民族认同构建理论。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成为时代主题，故而强调中华民族一体性，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领着党的民族观发展成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为保障各民族平等而实施了一系列向少数民族倾斜的帮扶举措，党的民族观的重点在实践层面上转移到了对中华民族多元性的关怀上。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结合新形势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这代表中华民族一体性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观的发展重点。表面上看，党的民族观的重心似乎随着时代变化而在“多元”与“一体”之间变化。但就本质而言，党的民族观对“多元”或“一体”的强调从未以否定其中一方为前提，而是结合时代背景进行有针对性的阐述。通过对自身民族观的不断反思与突破，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内涵的认知才能从由浅表到深入，从理论走向实践，最终成为现代中华民族认同的思想内核。

所谓“不变”，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观演变历程背后存在一条始终不变的原则，那就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认识、解决中华民族构建问题。面对中华民族认同构建问题，中国共

产党从一开始便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从各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的“破题”思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最终明确了对中华民族的界定：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境内各民族所组成的民族实体，其兼具了多元性与一体性两种特性，其中一体性较多元性而言处于更高层次上。但另一方面，从各民族群众根本利益出发的根本原则又使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各民族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是构建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前提条件，因此推动民族平等成为其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的工作方针。在党和国家推出一系列保障各民族发展权益的政策及举措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真正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与奋斗目标。正是通过对群众路线的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最终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多元性与一体性有机统一的有效路径，这也让构建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真正落在了实处。

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逐渐探索出了一套成熟的民族观话语体系。这套体系继承与发扬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独特意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继续贯彻发扬这一民族观，中华民族才能真正以团结、凝聚的姿态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84.
- [2]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七册 [M]. 北京：中华书局，1989：21.
- [3]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一册 [M]. 北京：中华书局，1936：4.
- [4] 陈连开. 中华民族研究初探 [M]. 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19.
- [5] 孙中山. 孙中山选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21.

- [6][7][8][13][14][15]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G].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4、18、17、726、595、603.
- [9]郑大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J].近代史研究,2014(4):7.
- [10]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N].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02-13.
- [11]马戎.“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4.
- [12]励轩.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精英关于中华民族建设问题的讨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2):21.
-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1-623.
- [17]杨富强,龚怡.试论红军长征对少数民族的影响[J].社科纵横,2005(5):144.
- [18]金炳镐,王铁志.中国共产党民族纲领政策通论[M].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18.
- [19]沈桂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对策[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1):60.
- [20]马戎.中国社会的另一类“二元结构”[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93.
- [21]周平.中国何以须要一个国族?[J].思想战线,2020(1):107.
- [22]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17-12-01.
- [23]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EB/OL].(2014-09-30).<http://cpc.people.com.cn/n/2014/0930/c64094-25763749.html>.
- [24]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EB/OL].(2021-08-28).http://m.news.cn/2021-08/28/c_1127804776.htm.

责任编辑:宋好

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的挑战与对策

——以浙江省为例

李 腾

摘 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基层实现组织化是基层统战工作的重要着力点,这既是有利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巩固我党执政基础、优化基层治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必然选择。相比于省市层级,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无论在工作力量还是工作对象上都存在特殊性,而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在组织设计、组织整合、组织功能和组织变革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升。本文从组织视角出发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

关键词:新的社会阶层;基层统战;组织化

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1-00068-09

一、引言

新的社会阶层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在原有阶级阶层基础上,从传统的工人、农民阶级以及知识分子阶层中分离出来,具有成长型利益的新社会群体,包括民营企业 and 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 and 新媒体从业人员^[1]。自 2001 年这一概念被提出以来,新的社会阶层凭借其庞大的规模、较高的知识水平、较强的创新意识、特殊的职业背景,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政治参与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然而,其个体原子化、高流动性、低依附性、低认同感、思想多元的特征也使新的

社会阶层成为党治国理政中潜在的不稳定因素^[2]。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发挥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如何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这一有别于传统“单位人”的群体有效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正面作用,成为新时代统战工作新的课题。

2015 年,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作出专门规定。之后,就“如何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这一问题,中央到地方,都在多个层次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在制度层面,中央于 2017 年印发了《关于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

收稿日期:2021-12-16

作者简介:李腾,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民营经济统战工作。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统一战线智库课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统战研究”(2021TZBH25)的研究成果。

意见》，此后的几年间密集出台了《关于加强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建设的意见》《关于2021—2025年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发展的实施意见》，更于2020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专门增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一战线工作”一章，初步形成了以《条例》为指导，以《关于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意见》为统领，以各群体、各方面工作文件为支柱的政策体系。在实践层面，中央统战部于2016年专门成立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局，并从2017年起选择15个城市进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创新试点，之后又进一步扩大到34个城市。各地都陆续成立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等统战类组织，并探索建立实践创新基地，对相关活动进行社会化品牌化网络化运作，形成了一大批值得推广、能够复制的成功经验，并将其固化于《条例》之中。在研究层面，大量的学者在研究了新的社会阶层的结构变化、发展趋势、群体特点、成长规律、政治吸纳和社会心态等基础上，论证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将其视为党和国家开展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手段，并就目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工作中的问题和瓶颈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3][4][5][6][7]}。

然而，无论在制度层面、实践层面或研究层面，此前主要聚焦于中央、省级以及大城市，甚少关照到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工作。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不断向二三线城市迁移，他们的职业流动越来越大，对社会治理和国家建设的参与越来越深入。因此，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重心正在不断向基层下移，需要团结的人越来越多，面临的任务越来越重，肩负的使命越来越大，而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正是开展这一切工作的重要基石。但长期以来，受限于思想认识不足、资源力量匮乏、手段方法单一，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

尤其是二三线城市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尚未形成规模，也没有形成系统，无法适应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逐渐从做标志性人物工作转向惠及“普通”人士的需求。本文认为，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工作都应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也应是基层统战工作的重要着力点。为了更好地提升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水平，本文将采用组织理论，分析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的逻辑起点、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特点，并从组织架构、组织整合、组织载体、组织变革四个方面阐释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工作的经验、挑战和问题，寻找提升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水平的有效路径。

二、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的逻辑起点

随着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涌入基层。在基层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成为基层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和增长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是指通过再组织的形式将处于非组织状态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整合起来，以更好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中生力军作用的过程^[8]。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主要包含三个维度：一是通过各种组织，如人民团体、政协、社团、行业协会等，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行吸纳；二是将不同的新的社会阶层组织进行有机整合以形成组织体系；三是使统战部门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之间形成具有发展性的协作与协同关系^[9]。对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行组织化的逻辑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实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

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呈现出高度的个体原子化特征，常年游离于传统组织外，缺乏社会参与及人际交往的常态化通道。职业流动性大、体制外的特点使其很难享受到国家的相关福利，在

一定程度上缺乏内部凝聚力和安全感。创新性强、高知识背景的特点使其有较高的自我价值实现诉求,尤其在政治参与方面亟待官方的认可。发展性需求突出、价值追求多样的特点使其对实现共同利益和价值整合有更高的需求。以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特点决定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是实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全面发展的客观需求。推动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不仅为他们克服生存极限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也为其利益获取、自我成长与事业发展整合了更多合法性的资源、信息和平台。组织化亦可帮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获得官方认可、构建有序参与政治的渠道,为其发挥价值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基础。

(二)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优化基层治理、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必然选择

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分布面广、专业性强、种类繁多、身份超脱,是我国发展与治理的宝贵资源。他们不仅是经济转型升级、创新创造、依法治国、民主建设、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力量,也是我国橄榄型社会的重要基础^[10]。将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起来,有利于将原本处于离散状态的新的社会阶层大量人才、资金、知识、信息等资源有效统筹和整合起来,助力我国高质量发展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呈现出高度的群体碎片化特征,在职业方式、收入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上存在巨大的差别,在阶层认同、价值体现上存在较大分歧,缺乏共同体意识。部分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社会上的公信力有待提高,而另有部分人存在矛盾的政治心理却又具有一些常人没有的特殊能量和动员能力(比如具有一定的社会感召力、舆论引导能力、社会情绪渲染能力等)。因此,如放任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处于无组织状态或非组织状态的话,不仅不利于凝聚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力量,而且更有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潜在风险。尤其在一些敏感事件发生时,部分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可能

会扮演“杠杆”或“助推”的角色,成为意识形态风险的放大器和催化剂^[11]。可见,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不仅是优化社会治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选择,也是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的重要手段。

综上,将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起来,在基层实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既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自我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国家富强的必然选择。

三、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的特点及探索

(一) 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的特点

相比于省级和市级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工作,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工作有其自身的特点,也和高层级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工作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既体现在工作力量上,也体现在工作对象上。

在工作力量上,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工作明显呈现出思想认识不足、资源力量匮乏、手段方法单一的短板,但也存在着相比高层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工作更强的开放性和社会性。虽然绝大多数基层都已构建了由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相关部门和机构分工负责、协同配合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并依托这一工作格局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工作进行统一谋划、统一部署,但是很多部门并没有完全树立大统战意识,依然认为统战工作是统战部门的事,不愿意进行资源配合,没有形成合力。而基层统战部门事多人少、力量保障不足几乎是常态,很多镇街和园区甚至不存在专职的统战干部,就更遑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有专人负责。但也正因如此,基层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工作更加善打“借”字诀,通过“共建”“联手”“互帮”“结对”等工作方式,资源共享、利益互助,做到“不为我属,但为我所用”,更加依赖“统战+”开放合作机制,探索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主体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双向结合的组织形式。

在工作对象上,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旗帜性明显不足,代表人士与普通成员差别不大,在工作内容上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工作有更针对性的要求。相对于省级层面和市级层面,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普遍处于事业发展初期,个体能量与影响力普遍较小,这为代表人士队伍的选拔培养造成了一定难度,但也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工作由聚焦“关键少数”转向普惠“绝大多数”创造了天然条件。与此同时,相对于省级层面和市级层面,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普遍对统战工作了解不多、认知度不高,对自身的身份认同度更低,对统战工作存在抗拒心理。因此,在基层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工作更加强调“隐统战性”。基于以上因素,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工作除了强调政治性以外,需要更加偏向服务性,通过开展各种趣味性、普惠性的活动提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使命感、价值感、认同感、获得感及幸福感,做到“寓统战于服务”。

(二) 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探索

基层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方面开展了以下探索。

在组织设计上,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以下简称“新联会”)作为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起来的主要抓手。绝大多数基层皆已在县级层面成立新联会,部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较多的县区还在此基础上,建立分专业、分人群、分地区的新联会分会或行业联盟。例如,杭州市拱墅区形成了既有鲜明拱墅特色,又有较强推广价值的“一核三盟”组织体系。“一核”,即以“运河·同心荟”为核心品牌;“三盟”,即以枢纽型社会组织公羊会为龙头、非遗传承企业“小巷三寻”等为骨干的公益引领型联盟,以新媒体新青年联盟为龙头的同行互动型联盟,以“武林地e盟”为龙头的多跨协同型联盟。这种“1+N”组织模式不仅有助于精准覆盖和辐射更多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形成“拼图效应”,也有助于挖掘和培养

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

在组织整合上,绝大多数新联会采用“联合、嫁接、卷入”三条路径来拓展组织资源,以克服自身规模小、载体少、影响力弱的问题。第一条路径是借助当地镇街党委的力量,联合党组织的资源开展新联会工作和活动,这是以区域为单位设立基层新联会最常见的组织整合方式,在杭州、宁波、湖州、温州等地都已得到了广泛应用。第二条路径是将新联会嫁接到一些成熟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行业性的自组织上。如湖州德清县在其枢纽型慈善组织“青禾公益”上嫁接成立了青禾公益新联会,借助其资源推动团体共助,创建公益合作平台,打造团社共育。第三条路径是将新联会成员自带的资源卷入到新联会建设上。如宁波市鄞州区的鄞和社会协同治理创新实践园在矛盾解调方面的建树,很大程度上是借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沈颖程律师所领衔的宁波市甬安社会评价研究院。该研究院对社会风险、舆情、公共服务、政策绩效等展开评估和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分析报告和预警机制,为提高决策的前瞻性、将矛盾化解更加前移提供了帮助。

在组织功能上,绝大多数基层秉承“组织+平台+活动”三位一体联动思路,以项目化和品牌化打造有辨识度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载体,增加组织黏性,最终形成以新联会为骨架、实践创新基地为实体化功能辐射平台,多种活动全面开展的模式。例如,湖州市德清县依托各级新联会,建立了组织建设、聚才引才、联谊交友、建言献策、创业帮扶、教育培训,公益服务、实践锻炼八大平台,坚持“4+N”活动模式,即每个季度以政治读书会、专题讲座、主题讨论等形式开展一次全体会员活动;同时,根据阶段性工作和会员群体的实际需要,不定期举办各类政治引领活动、教育实践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凝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共识,满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需求。这些做法既激发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

心，也为他们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在组织变革上，越来越多的新联会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引导教育、联谊交友以及对外宣传。几乎所有的县级新联会都拥有自己的“两微一端”，通过微信群、微信公众号、微博进行新联会活动的开展和宣传。在网络人士聚集的县域，有部分基层新联会开始配合当地统战部门探索开发“智慧统战系统”。例如，杭州市上城区、拱墅区和宁波市鄞州区均已开发了新联会数字可视化系统与信息集成系统。与此同时，部分新联会开始探索构建具有县域特色的新联会组织文化，并创设县域新联会的 LOGO 和口号，以提升新联会对外形象和社会认知度。例如，杭州市萧山区新联会的 LOGO 由金色“新”字与蓝色“潮”字的两条波浪构成，总体字形为“萧”字，该会提出“凝聚新力量、筑梦新时代”的组织口号。

四、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面临的挑战

虽然目前绝大多数基层已完成了“建组织、搭平台、聚力量、拉队伍”的任务，但是离“密织网、广覆盖、活动多、作用强”的组织化目标还有不小差距。应该看到，在完成摸清底数、认识特征，依赖传统统战团体和政协组织进行新的社会阶层统战的 1.0 阶段后，绝大多数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已进入建立多层级、分地区新联会组织，分类施策以打造符合新的社会阶层群体特征的创新实践基地的 2.0 阶段。但也应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工作（尤其是新联会建设）普遍暴露出组织小散乱差、“僵尸组织”频现、活动不规范、组织无效率、社会影响低的问题。

从组织视角来看，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源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设置不健全、组织整合能力差、组织功能不完善、组织变革能力适应力弱。这些短板是任何处于成长期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都会面临的问题，只有克服这些问题，才能使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工作继续跃升至符合“统战+”思路的智慧统战 3.0 阶段。

（一）组织设计有待完善

基层在县域范围内建立各种类型的新联会，将域内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广泛组织起来，为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与现实要求和长远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组织的自我运行机制缺失。当前绝大多数的新联会组织由县级统战部门主导建立，并在县级统战部的直接指导下开展活动。这一方式虽能在新联会组织成长初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较少时起到减少中间环节、节约成本的作用，但是随着工作要求的日趋精细化、精准化，这种组织设置方式也必将难以为继。一方面，这与县级统战部门的统筹领导职能不相符合，容易造成工作力量和精力的分散；另一方面，从长远来看，也会从客观上削弱相关领域新联会组织的自主性。二是不同领域新联会的覆盖人群存在重合，组织设置的精准性有待提升。当前，各特色领域新联会主要是依托新经济业态、行政区域等完成组建，这在发展初期、人数较少时，能够起到多点开花、快速高效的组建效果。但是，随着未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增多，不可避免地会大量出现某一个体具有多重身份的现象，这就会使得依托不同方式组建的基层新联会，在覆盖人群上出现重合，甚至是多维重合。如果将来没有一个超前的制度设计用以提升基层新联会组织设置的精准性，就易出现几个新联会组织“要么争着发展会员、要么相互推诿不要”，而相关人士“要么不厌其烦、要么无人问津”的现象。三是组织覆盖面依然不足。虽然绝大多数基层新联会已将触角延伸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密集的街道、社区、楼宇，但是相对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规模和分布来讲，依然存在覆盖面不足的问题。尤其是随着乡村旅游、农产品直播带货等新业态的兴起，新联会组织没有覆盖到村的问题尤为凸显。

（二）组织整合有待强化

一是对组织整合的认识不足。当前，各类基

层新联会均处于草创阶段，对自身的定位和功能缺乏清晰的认识，无法有的放矢地获取相关资源。部分新联会对资源的认识窄化，将其仅仅等同于经费和政治安排，资源整合的视野仅局限于向上索取；另有一部分基层新联会将新联会等同于会长组织，仅仅依靠新联会会长班子的力量和资源维持正常组织运行。二是组织整合的力量偏弱。一方面大多数新联会规模小、场地经费不足、工作人员专业水平不高，仅有的工作力量都聚焦于如何开展上级部门规定的规定动作，无法分身谋取更多的资源；另一方面，新联会在社会上的存在感低、影响力偏小，导致参加基层新联会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普遍力量偏弱、能量不大，所能吸附和引入的外部资源偏少。这两方面都限制了基层新联会整合资源的能力。三是组织整合的意愿不强。受限于组织整合的认识和力量，很多新联会搭建的平台能级不高，开展的活动吸引力不足、效用不强。这使得统战部门对其继续投入资源的积极性不高，也使得参与其中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投入资源和嫁接资源的动力不足。

（三）组织功能有待提升

一是对新联会的政治属性强调不够。目前，大多数基层新联会还停留在为建机制而建机制、为搞活动而搞活动的被动应付阶段。部分统战干部和新联会班子成员对新联会的政治属性认识不到位，凝聚共识的开放度不够，发挥政治引领的作用不强，围绕基层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推进组织建设的意识不强。二是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服务存在极大的不平衡性。一方面，在服务对象上存在极大的不平衡性。基层新联会目前开展的服务活动主要以服务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高管人员和网络人士为主，甚少关照到自由职业者。另一方面，在服务内容上存在极大的不平衡性。基层新联会开展活动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事业关怀为主，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价值服务、心理服务和生活性服务较少且实招不多。三是提供给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发挥作用的机会偏少。绝大多

数基层新联会都致力于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公益事业方面的作用，甚少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提供在其他方面发挥作用的渠道，尤其缺乏帮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参政议政的渠道。另一方面，绝大多数新联会在开展相关活动时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使得很多活动无法最大化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价值作用，进而导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活动社会影响力偏弱。四是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队伍建设明显不足。目前绝大多数基层新联会的活动无法起到代表人士选拔培养的作用，缺少对代表人士发现培养、教育培训、推荐使用的机制平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安排偏少。

（四）组织变革有待推进

一是办会理念需要进一步变革。目前，不少基层统战干部依然持有“统战上层论”的思想观念，甚至有部分统战干部存在“统战就是抓关键人物，社会草根抓不起来”的片面认识；部分新联会班子成员以完成上级交办任务为导向，而非以服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利益诉求为依归开展工作。这些导致新联会办会思路不明，供给与需求错位。二是工作方法及工作机制有待创新。目前新联会的工作开展主要依赖传统手段，在工作力量不足的情况下，面对对象分散化和任务集中化的矛盾时，绝大多数基层新联会呈现出“小马拉大车”的窘状，直接导致了新联会组织活动力差、组织竞争力弱和组织动员能力弱的问题。三是综合评价体系亟待建立。绝大多数的县区没有建立对新联会及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综合评价体系，少数已经开展评价探索的县区也存在评价标准模糊、评价主体单一、评价方式及评价过程不统一的问题。这直接导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虽然被组织起来，但其作用发挥的效能却无法评估。

五、基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的对策

（一）完善组织设计

第一，规范新联会建设，完善自我运行机制。一是对新联会组织依法进行社会团体登记，制定

相关章程,推动新联会规范化制度化发展,保证新联会依法依规履行专业职责。二是加强对新联会工作保障,配足经费、配齐人员、配备场地,做到工作有人干、活动有人办。三是强化统战部门的政治领导功能,重点研判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成长规律和思想动态,为新联会提供系统性、规律性的工作指南,通过事前指导、事后考评的方式激励新联会进行自我运转。

第二,统筹运用“化整为零”与“化零为整”的组织形式,进一步完善新联会组织体系。坚持全方位多层级联动,在组织层面形成“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一核多盟”新联会组织体系。除了在县级层面成立新联会以外,一方面以地域为单位“化整为零”。本着“成熟一个、创建一个、带动一片”的原则在镇街、园区、大型社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密集的乡村建立新联会分会,通过制定年初计划、进行年中小结、开展年底述职等形式,探索建立工作积分机制,采取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相结合的激励机制,实施“僵尸分会”预警、警告、暂停活动、解散等约束惩罚机制,调动成员单位和人员的参与积极性。另一方面,以行业为单位“化零为整”。借助统战部门及其他各行业主管部门、“两新”工委的力量,统筹整合行业资源,形成行业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盟。在有条件的地区,成立跨行业协同联盟,实现不同行业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破圈融合、互补共赢。

第三,加强党建和统战协同,进一步拓展新联会组织覆盖。以“党建+统战”的组织化思路,坚持“党组织建到哪里,统战工作就延伸到哪里”的工作原则,建立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导向、党组织为依托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络点,借助网格化管理响应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各类需求,拓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结缘”“问需”“解忧”的渠道。

(二) 加强组织整合

第一,打通资源获取的通道,拓宽组织整合的视野。积极引导统战部门、新联会及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充分认识和正确评价新联会组织的定位,积极增强新联会与其他传统统战组织如知联会、欧美同学会等的链接与资源共享,用“统战+”的方式重新调动优势资源,打造相互协同的统战组织生态。在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尤其是规模较大、组织影响力较大、拥有旗帜性人物的枢纽型社会组织上嫁接新联会组织,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自组织与新联会进行有序整合,使新联会由“单一投入”变成“有效吸纳”。

第二,不断提升各级新联会的专业化程度,提升组织整合的力量。新联会强化自身的整合能力,关键在于增强其对所覆盖人群的吸引力和号召力。一方面要将构建培养专业化的工作团队作为重中之重,在县级新联会和部分规模较大的基层新联会中配备全职专业工作人员,同时加大对兼职人员的教育培训力度;另一方面按照“有效、有意义”的原则,不断优化各级新联会的活动方式,通过小组联谊、志愿活动、参观互学等形式,增强各级新联会特别是基层新联会的活动吸引力,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无论是何种层次和身份,都能够从中感受温暖、有所收获,进而增加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参与度和组织贡献度。

第三,政策赋能,积极完善新联会平台机制。统战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应完善各项制度保障,形成部门合力,将各级新联会作为发现和推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重要平台,通过有效的政策赋能,让各级新联会的平台载体功能具体化,从而从根本上提升各级新联会的政治地位,增加它们对覆盖群体的吸引力。统战部门应探索在县级新联会层面建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研究中心,研判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成长的规律,动态把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思想动态及需求特点,总结提炼各新联会运行的成功经验并进行推广复制。

(三) 提升组织功能

第一,强化统战部门政治引领的作用,凸显新联会的政治属性。一是发挥统战部门打造变革型组织的带动、牵引、凝聚作用。通过大调研

大走访，找准找全新联会面临的“组织多、作用少”“为搞活动而搞活动”的痛点堵点、难点热点。在调研走访中找思路找办法，分级分类制定针对不同行业特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禀赋条件新联会的政策措施，在工作中寻找共识、凝聚共识。二是紧紧把握推进共同富裕的重大历史机遇和中心工作重点。引导新联会将战略布局、工作重点、年度计划对接共同富裕主题，在差序推进共同富裕中抢抓新联会的发展机遇，在协同推进共同富裕中拓展新联会的社会网络，在示范推进共同富裕中展现新联会的活力魅力，形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推进共同富裕的浓厚氛围。

第二，以“一县一品牌”运作模式，精准开展新联会自我服务和活动。一是改变以往活动品牌过多、活动落点过散的局面，由县级新联会统一打造活动品牌，制定长远规划，集约有限资源，统筹开展新联会活动，避免多头、重复及形式主义等现象。二是盘活存量载体和拓展增量载体两手抓，在注重载体数量的同时更注重活动载体的质量。依托本地特色资源、统战资源以及所辖新联会成员的特点，探索其他统战对象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相互服务新机制，积极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基层治理方面的作用。三是鼓励基层统战工作领导小组把联席会议、现场会、座谈会开到新联会办公场所、工作场景中去，拓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政议政的机会和渠道。

第三，加强与相关部门合作，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队伍建设。一是建立健全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发现机制，瞄准并吸纳重点企业、重点社会组织、有代表性的自由职业者和网络界代表人士。二是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重点人群加强政治引导和教育培训，分级分类确定一批重点联系和培养对象，借助党校和社会主义学院等平台分批分期对其开展培训。三是将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纳入县级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总体规划，借助新联会等平台为其提供实践锻炼机会，并进行相应考核，为符合条件的新的社

会阶层代表人士提供挂职锻炼机会。四是建立“列名”制度，将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纳入到县级党委、镇街和统战部门领导联谊交友的范围。

（四）推动组织变革

第一，在思想层面上，牢牢树立起“利他统战”的理念，提升新联会的变革活力。一是引导广大基层统战干部正确认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重要性 and 特殊性，帮助广大干部在观念上从做“关键少数”工作向做“绝大多数”工作转变。注重主动作为、提前布局，积极发现、培育和壮大有前途、有希望的“草根”组织、新兴群体及个人，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行稳致远。二是引导新联会班子成员从任务导向向“以人为本”导向转变，梳理以“新联会成员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办会理念。

第二，在方法层面上，善用数字统战提升新联会的变革能力。一是由统战部门牵头，各级新联会协同，探索“高新区/镇街—产业园区—企业/社会组织孵化中心”三级网络搜寻模式，动态建立县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数据库，借助大数据，研判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流动趋势、舆论趋势及行动趋势。二是探索“e+”数字化合作模式，通过数字化云端交互、智慧化生活融入、互联网平台宣传、第三方载体支持，激发新联会资源优势，合作打造智慧“产业链”，更好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力量。

第三，在行动层面，变革体制机制，完善综合评价体系，提升新联会的变革绩效。一是创新建立轮值会长机制、与其他社会组织积分互通机制、荣誉授予机制、新联会退出机制，增强新联会组织运作的规范性，激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二是完善对新联会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综合评价体系，从事前预判、事中监管、事后考核，对新联会进行星级评定。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从思想素质、政治担当、事业发展、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参政议政能力进行全面评价，培养锻造一支信仰坚定、业务精通、有社会责任

感的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队伍。三是加大社会宣传,形成新联会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社会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 [1] 陈喜庆. 关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几个问题[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2): 4-15.
- [2] 白关峰. 论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化过程中的组织文化建构[J]. 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3): 59-64.
- [3][9] 后梦婷. 新的社会阶层再组织化的逻辑和实践路径[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5): 64-71.
- [4] 龚晨.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效组织起来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互动探析[J]. 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1(1): 27-31.
- [5] 杨卫敏.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与新时代统一战线创新拓展[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2): 8-16.
- [6] 张海东. 新社会阶层的结构化、组织化及发展趋势[J]. 江海学刊, 2019(5): 124-130.
- [7] 朱列. 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研究[J].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0(5): 72-78.
- [8] 张海东, 杜平. 从新社会阶层的崛起看社会治理创新[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2): 49-55.
- [10] 杨卫敏.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化与国家治理效能提升——以浙江省为例[J].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6): 11-21.
- [11] 张伟伟.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9(1): 42-49.

责任编辑: 吉强

统一战线基地：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载体

——江苏百家统战基地选介

苏统轩

摘要：统一战线基地是开展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载体，是面向广大统战成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统战优良传统展示、创新经验启发等的重要平台，承担着思想引领、教育培训、社会服务、联谊交流等重要功能。近年来，江苏省各地积极发挥统一战线资源丰富、人文荟萃的优势，结合实际，在加强统一战线基地建设、助力统一战线高质量发展方面进行探索实践。

关键词：江苏；统战基地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22)01-00077-04

统一战线基地是开展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载体，是面向广大统战成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统战优良传统展示、创新经验启发等的重要平台，承担着思想引领、教育培训、社会服务、联谊交流等重要功能。近年来，江苏省各地积极发挥统一战线资源丰富、人文荟萃的优势，结合实际，在加强统一战线基地建设、助力统一战线高质量发展方面进行探索实践。2021年6月至10月，江苏省委统战部在全省开展了“庆百年华诞、创同心家园——江苏百家统战基地巡礼”活动。经各地各部门遴选推荐，在综合考虑各基地基本情况和网络投票情况的基础上，进行了专家评审，并经省委统战部部务会同意，最终产生了100家基地。这些基地生动展现各领域统战工作的鲜明特色和优势，发挥出积极作用，现选取部分基地进行简要介绍，以飨读者。

一、周恩来纪念馆

周恩来纪念馆位于淮安市淮安区桃花垠永怀路2号，占地总面积40万平方米，1986年3月由中宣部批准建设，于1992年1月6日对外开放。纪念馆开放至今已圆满接待中外瞻仰观众4000多万人次。

周恩来纪念馆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展示周恩来光辉一生的综合性纪念馆，是全国首批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全国文明单位，被中组部确定为党性教育现场教学基地，是全国首批76个党性教育基地网上展馆。2017年，纪念馆被江苏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评为江苏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基地。

在馆区南北800米长的中轴线上，依次建有瞻台、主馆、周恩来生平业绩陈列馆、周恩来铜像广场、仿中南海西花厅、西花苑碑园、情归厅

等纪念性建筑。周恩来纪念馆围绕不同教育主题,先后推出了多个专题展。编排《风范——周恩来精神情景报告会》和《不朽的旗帜——周恩来精神情景故事会》,开展全国范围内的宣讲。近年来,纪念馆充分挖掘教育资源,传承和弘扬“恩来精神”,推动纪念馆红色文化创新发展,为持续深入开展民营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荣毅仁纪念馆

荣毅仁纪念馆位于无锡市滨湖区荣巷西浜,占地面积 1.12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474.61 平方米,于 2012 年 5 月正式对外开放。

纪念馆主要包括事迹陈列馆、荣氏故居、大公图书馆及荣毅仁北京旧居 4 个部分。事迹陈列馆分为序厅和东西两侧展厅。序厅中央陈设汉白玉荣毅仁塑像;东西展厅则分别介绍了荣毅仁实业报国的从商历程和勤勉为政的国家领导人经历。荣氏故居主要为荣毅仁及家人当年生活的相关居室。大公图书馆由荣家独资兴建,于 1916 年建成,是中国第一个正规的对外开放的乡村图书馆。荣毅仁北京旧居是按北京史家胡同四合院原样复建的。除复建原四合院场景外,其内部也基本保持原来的布局陈列,办公、生活家具等照原样复原,其中,大部分都是珍贵的原件。

近年来,荣毅仁纪念馆挖掘具有“荣氏印迹”的统战文教特色课程,让统战领域代表人物的精神遗产在新形势下继续发扬光大。同时,纪念馆发挥统战名人故居在文化培育、宣传与传播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使之成为社会各界正确认识统战文化的基地和深入开展对外交流合作的“文化名片”。

三、费孝通江村纪念馆

费孝通江村纪念馆位于苏州市吴江区开弦弓村,占地面积 1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2200 平方米,于 2010 年 10 月建成。开馆至今已有 30 余万人次参观。

整个纪念馆由 6 个部分组成,分别是费孝通

江村纪念馆、江村历史文化陈列馆、费达生江村陈列馆、孝通广场、景观池和碑廊。馆内现有费孝通铜像 1 座、等身蜡像 2 座、展板 177 块;另有实物展品,包括书籍、影印手稿、报纸、费孝通所获奖牌奖状证书、作品刊物封面等。纪念馆全面展示了费孝通的学术思想和理念,记录了费孝通兢兢业业奋斗一生的光辉历程,展现了他志在富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爱国理想,关注民生的民本情怀,脚踏实地、躬身实践的工作作风。

纪念馆自开馆以来接待过众多海内外文化学者和侨胞,在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开展华文教育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以及加强社科普及教育和人文教育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四、王选事迹陈列馆

王选事迹陈列馆位于无锡市解放东路 867-1 号,场馆面积共 2653 平方米,于 2008 年 12 月底建成。陈列馆于 2010 年 3 月挂牌“九三学社江苏省委思想教育基地”,于 2015 年 11 月成为首批“九三学社全国传统教育基地”。开馆至今已有 20 余万人次参观。

陈列馆利用了原辅仁中学旧址,保持了民国建筑风格,并与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东林书院毗邻。馆舍由主体展区和辅助区两部分组成。其中,主体展区分序厅,莘莘学子、立志报国,自主创新、敢为人先,当代毕昇、功在千秋,甘为人梯、大家风范,身居高位、鞠躬尽瘁,学习王选、勇攀高峰 7 个部分。展馆有珍贵文物、史料 300 余件。多年来,陈列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创新实施“完善主题展览”“探索个性宣讲”“创新实践活动”三项机制,取得良好效果。

五、新型政党制度伟大历程展馆

新型政党制度伟大历程展馆位于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是由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策划建设的一座专题展馆。

展馆通过全面展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历程,系统回顾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民主党

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共同创造，全方位表现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特色、制度特色和实践特色，多角度反映新型政党制度的效能优势、运作形式，讲好新时代多党合作故事，彰显制度优势，坚定制度自信。展览以重大历史时期划分篇章，由“万水朝东”“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同心同行”“制度自信”5个部分组成。围绕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打造“共铸乾坤”“五一口号”“制度大成”“人物风采”4个“核心亮点”。

新型政党制度伟大历程展馆是目前全省第一家专门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专题展馆，集中展示了新型政党制度发展与创新成果，其内容政治性强、思想内涵丰富、社会教育意义重大。

六、高邮市菱塘回族乡民族文化宫

高邮市菱塘回族乡民族文化宫位于扬州市高邮市兴菱路61号，占地面积3434平方米、建筑面积8282平方米，于2016年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文化宫包括经济社会发展馆、乔登江院士事迹展览馆、家风馆、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回乡好人馆、红石榴家园、扬州图书馆菱塘分馆等场所。文化宫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和“两个共同”主题，充分发挥阵地作用，广泛深入开展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回乡好人馆围绕“寻找菱塘真善美，传递时代正能量”主题，开展“回乡好人”评选活动；乔登江院士事迹展览馆作为统一战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提供了革命传统和理想信念教育的生动课堂；红石榴家园为全乡各族人民打造了一个信息互享、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精神家园；多次开展以“民族一家亲、共圆中国梦”为主题的书法展、中华诗词展、文艺演出等各类活动。

七、爱德基金会（江苏省宗教公益培训基地）

爱德基金会位于南京市汉口路，成立于1985年，是由老一辈中国基督教界领袖发起、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参与，并经江苏省政府批准成立的公

益组织，也是江苏省首批5A级社会组织。2015年11月，爱德基金会被江苏省委统战部、省宗教局定为“江苏省宗教公益培训基地”。

爱德基金会作为大陆成立的第一家具有宗教背景的基金会，一直致力于促进教会参与社会服务。2009年，爱德基金会与江苏省基督教两会率先成立了“江苏基督教爱心公益基金”，募集资金为教会开展社会服务提供帮助。同时，该公益基金积极推动建立以教会办养老服务机构为主要成员的社会服务网络。目前，该网络已有120余家成员机构，分布在江苏、山东、安徽等10多个省份。

基地除了推动基督教界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外，还致力于多宗教对话与合作，推动不同宗教团体开展公益慈善工作。2016年5月，基地管委会成立，其宗旨是搭建全省宗教界公益慈善合作平台、探索宗教公益慈善发展路径、加强宗教公益慈善能力建设、促进宗教公益慈善健康发展。

八、张謇纪念馆

张謇纪念馆位于南通市海门区常乐镇状元街东首，占地面积约2.67万平方米，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于2021年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纪念馆主体建筑由张謇故里祠堂、张謇史料陈列馆等组成。张謇史料陈列馆于2010年建成开放，展厅由出生成长、实业救国、教育兴国、社会事业与纪念研究5个部分组成，共展出关于张謇业绩的珍贵历史照片327幅、实物540件、主题场景12个，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再现了张謇一生的奋斗历程和伟大业绩。

纪念馆以传承弘扬张謇“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族家国情怀、“尺寸行之”的务实精神、“不与草木同腐”的社会参与精神为主题。近年来，纪念馆不断丰富展陈内容、增强参观体验、放大研学功能，进一步提高教育引领效应。同时，纪念馆围绕张謇在海门的创新创业，特别是青少年时期的经历，设计开发相关课程，让来馆参加现场教学的人员能够学习好、传承好张謇的“爱国情

怀、开放胸襟、创新精神、诚信品格、社会责任”。

九、东南大学海峡两岸交流合作实践基地

东南大学海峡两岸交流合作实践基地位于南京市四牌楼 2 号。东南大学拥有台湾“经济之父”李国鼎、一代报业巨子余纪忠、“东方居里夫人”吴健雄等杰出校友。四牌楼校区以“国立中央大学”旧址被列入第六批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名单，入选首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这些历史印记对于唤醒广大台湾同胞尤其是台湾青少年一代的国家记忆，可发挥积极作用。校区内建有“李国鼎图书室”、第一个华人科学家纪念馆“吴健雄纪念馆”等。“华英文化教育基金”“海峡两岸信息技术研讨会”持续开展活动。

基地自获批以来，开展了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活动。召开第二十二届海峡两岸信息技术研讨会，开展“红色经典诗歌抄写”活动，讲好“梅庵”故事、开展“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展”，组织开展东南大学港澳台生南京金秋二日团活动等。

未来，基地将进一步完善功能定位，逐步建设成为有历史印记（民国建筑群）、有特色品牌（海峡两岸信息技术研讨会）、有文化交流（李国鼎图书室）、有功能拓展（共青团二大红色基地），集教育文化学术交流为一体的统战教育实践基地，

广泛团结海内外台湾同胞，发展壮大爱国统一力量，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十、青果巷

青果巷位于常州老城区。这条长仅 400 多米的小巷，自明清以来走出了近百名进士和几十位文才武略、享誉中外的知名人士，包括史良、刘国钧、刘海粟、周有光等著名的党外代表人士。散落在巷中的数个名人场馆，在江南古韵中彰显着统战文化的特色。

史良故居位于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东北角，里面展示了史良在人生各个阶段的杰出历程。青果巷 16 弄，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的故居。位于 141 弄临河一端的“礼和堂”，是民盟盟员、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诞生之处。新礼和堂最南一进为常州盟史馆。“礼和堂”对门的“贞和堂”是唐氏八宅中的主宅，曾汇聚众多名人，清朝诗人庄楷、状元画家钱维城兄弟，近代以来的实业家张謇、法学家张志让、无产阶级革命家张太雷都从这里走出去。统战群英厅作为常州市爱国统一战线教育基地，展示了常州 10 位统战名人的事迹。他们参与并促成了中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的蓬勃发展，成为铭刻在常州乃至全国统战事业进程中的不朽丰碑。

责任编辑：吉强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2 年征稿重点选题

一、参考主题

- (一) 统一战线基本理论、范畴与话语体系研究
- (二) 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创新发展研究
- (三)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
- (四) 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
- (五) 统一战线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研究
- (六) 统一战线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 (七) 制度效能与治理优势研究
- (八) 中国式政治文明新形态研究
- (九) 中共二十大专题研究

二、相关说明

以上选题方向仅供参考，欢迎广大作者据此结合自身研究专长和所关注问题自拟题目撰稿。对参考主题范围内稿件，我刊将优先选用，优稿优酬。来稿敬请关注以下基本要求：

- (一) 来稿要求做到导向正确，主题突出，论点明确，论据充分，逻辑严密，文字通顺。
- (二) 稿件一般 8000—12000 字，请一律通过本刊采编平台投稿。
- (三) 来稿请注明投稿日期、作者简介（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单位名称、职称、职务等）、联系方式以及详细地址，请注重学术规范（须有内容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部分）。
- (四) 论文须为原创，严禁任何学术不端行为，重合率不高于 15%，每篇论文引用期刊论文不少于 5 条。